

旧书

新技术革命参考资料之二

《第三次浪潮》作者新著

托夫勒未来对话录

(节 录)

新技术革命参考资料之二
《第三次浪潮》作者新著

托夫勒未来对话录

(节 录)

山西省图书馆研究辅导部

编 者 的 话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于1983年出版了新著《预测和前提》，这是他继《未来的冲击》（或译《未来的振荡》，1970年）、《关于经济痉挛症的报告书》（1975年）、

《第三次浪潮》（1980年）之后写的第四本书。前三书纵论60—70年代的汹涌世势，这本新著显然企图小结前20年，接着展望后20年，即至本世纪的终局，尤其瞩目于关键的80年代。

此书篇幅不大，仅200页，分上下两编。内容，除卷首出版前言《缘起和内容》外，上编谈“预测”，亦即展望今后，计分七章（《经济大动荡》、《将来的工作》、《日本等等的神话》、《资本主义乎？社会主义乎？》、《信息政治》、《男女之间》、《种族、权力、文化》）；下编论“前提”，论述作者思想形成的根据以及研究方法等，计分四章（《述余漫笔》、《未来学种种》、《研究之道》、《变革的风源》）。

本书采用问答方式，托夫勒着重回答西方的进步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其理论观点的批评。批评者指责他抹煞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阶级对抗等，认为他是“技术决定论者”。

托夫勒的基本观点可能有许多谬误，但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研究。他认为，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

家为推进现代化不必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要尽可能及早发展先进技术工业，否则将始终落在西方国家的后面。他还指出，在新技术基础上的工业正朝着中小型方向发展。

原书散见于几种刊物之中，我们将其中一些章节集中编排，以飨读者。

缘起和 内 容

1970年7月，一本叫《未来的冲击》的书问世了，自那时起，在全球卖了700万册以上。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须知此书既不谈好莱坞，又与性事无缘；既非万宝全书，又不教人以致富捷径，而是一部对各界人士都有深刻影响、涉及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的严肃著作。现在，“未来冲击”这句话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了，出现在许多词典里。

《未来的冲击》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在1980年又出了一部《第三次浪潮》，比前书更富学术味，更重分析，更有社会意义，也列为国际畅销书，在日本破了纪录。此书已译成丹麦文、希伯来文、土耳其文，至于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更不在话下了。书在北京也出版了，不过沙特阿拉伯是禁止的。华沙军事戒严令颁布之前，也曾准备出波兰文版。当这本《预测与前提》里的长篇对话进行之日，托夫勒正忙于同日本、加拿大、美国的电视人员张罗着要以《第三次浪潮》为蓝本，摄制一套大型节目。果然如此，托夫勒的言论今后在世界上还大有发展的余地。

上述《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两书，加上作者一些早期著作，合成了托夫勒观点的完整体系，无论你赞成不赞成，都不得不承认它立论新奇，极富挑战性。托氏的著作集中写变革，纵论其速度与去向，将心理、经济、技术、历史等领域千头万绪的信息汇于一炉，从而推出关于今日天下的惊世骇俗的言论。

要掌握《预测与前提》的主要论点，并不需尽读托氏的

旧作，因为本书的形式内容都自成一格，自为一体，其中充满崭新的材料和引人入胜乃至令人咋舌的见识。

由于托氏各书是声息互通的，因此这里有时也免不了提到《未来的冲击》和《第三次浪潮》。我们在本书，尤其是其中开头两章，扼要介绍了托氏上述两书的一些概念，以方便初涉托氏著作的人。

而在许多问题，如女性地位、“脑力工人”、政治和工业政策、历史哲学等方面，则本书内容所及都超越旧著，对旧著涉论未深的部分，也有所增补。

“未来的冲击”（书名，也是新观念）的主要意思是：社会变革和技术革新的加速发展，使社会上所有的个人和组织都越来越窘于应付了。我们不得不想法子适应的不仅是变化本身，还有那瞬息万变的速度。托夫勒指出：变化的方向和内容姑且不论，变化速度的本身也有其种种后果。他在论及“不期而至的未来”时，以新奇精辟之词剖析了变革的过程，从而得出结论说，民主政治若要存在下去，就得 更充分，更开放，还要更兑现才行。

《第三次浪潮》与《未来的冲击》相辅相成而着力于探讨变革的方向，它开拓了托氏的思想体系，深化了他的理论基础。

《第三次浪潮》的主要内容可以概述如下：世界上的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都一样）正处在“总危机”之中。托夫勒认为，10,000年前的农业革命为人类社会掀起了第一次的变革洪波，开始于距今大约300年前的工业革命则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使世界经历了第二次的变革浪潮。而时至今日，我们又面临一个了不得的转变关头了。当代技术、经济、政治、家庭生活、能源消费以及

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新趋势，招来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三次大转折，即过渡到第三次浪潮的社会形态。

托氏此说一出，反对者有之，赞同者有之。《未来的冲击》曾获法国的最佳外国书籍奖。（以前给过索尔仁尼琴、W·H·奥登、劳伦斯·杜雷尔。）

托夫勒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新社会学研究院执教，并任罗素·赛基基金会研究员。他曾在美国国会、白宫、日本议会、英国国会的小会上讲过话。他还曾在一天之内分别向美国共和党的州长会议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做报告，这样的事是仅见的。此外，他还到下列各处讲过话：莫斯科的美国研究所，东京的日本生产率研究中心，新德里的国立物理实验所，哈佛的政治学院，以及许多大学、大公司。

托夫勒每会必谈的是：当前社会之如何不合时宜，我们为何需要在思想、政治、经济、家庭领域里来一场革命，以及社会发展趋势如何说明了这场革命已是在所必行。托氏的见解颇富政治意味，但他自称在当今的政治行列中既不属左，也不属右。

他大声疾呼说，我们的政府制度陈旧过时了；他竭力主张大兴经济改革；他支持妇女权利和一切社会少数集团争取平等、认同和使命感的权利。尽管如此，托夫勒却同眼下的任何政党或运动都无干系。他深以为，政治上以左右分野的想法，在高度技术发达的国家是日见其不中用了，今天社会上的重大矛盾，都是因为别的一些方面出了毛病之故。

他的话对吗？今天的政治运动都不合时宜了吗？我们社会的种种传统矛盾（种族、阶级、性别、年龄、家族）都不如另外一些矛盾（据说根子更深，冲击力更大）那么重要了吗？反之，是否托夫勒笔下的变革浪潮倒是次要的东西，一

遇到重重的传统政治关系和矛盾，就会败下阵来呢？左翼和右翼的政治难道（如他所说）都不中用了？还是对我们时代的事业仍然不无意义呢？他着重谈所谓“浪潮的互击”，是否就是要我们看到我们社会的主要断裂层所在，了解今天社会和政治变化之快，从而加以引导？他的这一套，对我们控制变化有什么新的价值呢？托夫勒使我们注意到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趋势，但是与此同时，他是否忽略了另一些社会关系和社会冲突呢？这些因素对于社会趋势什么时候发展到顶点，是有决定作用的，而如果我们不兢兢业业对付它们，我们的前程就决不会像托氏想象中的“第三次浪潮”式那么美妙。托夫勒的精言诡论，其有益于我辈之跻于大同世界者，能有几何？

本书的基本内容，是南城出版社人员走访托夫勒，多次长时间对谈的结果。对谈的思路是假设我们的现存社会体制摇摇欲坠，颇不适应我们的时代及其人民，如果不想在茫茫来日惨遭灭顶，唯有求变，快变。但是，什么样的变才是必要的，可能的呢？我们的社会能否在不平等、有剥削的条件下继续存在下去呢？是否需要有所谓新高度的是非观、民主制和社会多元化以丰富人人的生活呢？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取决于：（一）当前的变革的基本因素是什么，最终的目标何在？（二）我们公民在这种社会发展进程中如何跟上形势，并有所作为？

托夫勒同意我们合作写书的建议后，我们就派了一位编辑去访问他，进行了一系列内容广泛的谈话。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双方一定有许多不同见解。托氏认为，眼下许多所谓左翼人士的观点是绝对地过时了，而访者却不以为然，对左翼政治和斗争的重要性仍然深信不移。但是，本书不能搞成

一本双方对吵书，因为几次交谈，之不能解决全部歧见，其理至明。我们只想创造一种争鸣气氛，使托氏得以增益其已有的论点，扩延之于新的领域，而在缘到兴来之际，回答若干来自左翼论客提出的批评性意见。

说到这里，读托氏书者不免要问：为什么作者以其对世界影响之大，见知于商界之深，又颇出入于大书贾之门，却偏爱同一个政见多异的访者作抵掌长谈呢？

托夫勒的回答是：这个办法可以给他一个面对左翼提出西方主流报刊极少涉及的问题的机会。他是乐意考虑和答复那些有关所有制、阶级、政治权威、种族矛盾、性别歧视，以及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弱点的。

上述问题，对于关心我们社会前途的读者，当然是极端重要的，因为不消多久，我们人人都得面临这些问题。

本出版社对这项工作也挺感兴趣，因为我们觉得，这些问题在主流新闻媒介是极少涉及的，有之，往往也流于肤浅。本书尽管在体例上不采正面交锋的形式，问答之间的争议大多也避免弄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但我们认为，这种互相切磋的方法还是有好处的，我们这样做法未始不是开了风气之先呢。

上编《预测》，谈的是托夫勒对一些当前问题的最新见解，如：经济危机，工作和失业问题的前景，关于日本的神话，各国应付工业社会崩溃的战略考虑。他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的前景，他纵论迫在眉睫的未来社会中妇女和其他少数集团的地位。

下编叫《前提》，同上编很不一样，也更富于个性。为了使读者对形成托氏的世界观的内在因素有所了解，我们在下编之始加入一章传记文字，用以说明他个人历史背景中有些

什么经验使他形成了现在的种种非正统观念？接着是一章有关未来学派的历史，最后是深入探讨托夫勒的工作方法：他怎样进行研究工作？他是怎样把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息融合到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里的？他是怎样为变革塑造模式的？

却说当日我们长时间对话完毕，便着手整理盈尺的纪录稿。这可不单是剪剪贴贴，加加标题就能了事的，因为不久之后，托氏在删裁润饰之余，又补写了不少新思想（加上不少新段落、新问题、新答话），因此，我们虽则仍然大致保持了采访对话实况的结构，但编成的稿子却较之原来的大大扩充，大大提高了，读来绝不逊于任何一部原著文章。对话原稿只是作为谈锋的轮廓和走向，未作寻章摘句的信本看。我们相信，《预测与前提》这本书将怂恿读者（不管是否赞成书中的具体论点）去重新审视他们心目中对未来的展望，以及他们倚为根据的种种假设。

上编：预 测

1. 经济大动荡

我们正感到一场经济地震的最初颤动，我们要好生准备起来才是。

说话之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人数已经高过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期，共产主义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则形同破产，苏联的经济也是一团糟。全球金融体制摇摇欲坠，性命危浅。奈何我们的经济学家思想之脱离现实，却是与时俱增！

不过，这场危机的性质，却大大被误解了。我们许多最基本的经济概念已经过时了。保守派也好，自由派也好，“右”派也好，“左”派也好，都拿不出答案来，因为他们一概把自己反锁在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清规戒律之中了。

眼前的事，并不像刮飓风那样不伤地面，倒像是地震开始时的情况。因为我们整个经济学的地下基础在移动，在断裂。我们说要努力防止重大的经济崩溃，但是我们只注意地表现象，不顾深层结构，而真正的大变动正是在那里发生的。

南城社编辑问（下简称问）：你用“地震”这个吓人的字眼来形容今天我们经济领域里发生的事，或者开始发生的事。你警告大家经济快要发生大变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你在1975年出版的《关于经济痉挛症的报告书》里已经预言了眼下的许多经济情况，但是，无论在那本书或是在《第三次浪潮》里，你都没有提到过现在的这场危机对某些

人也许有好处，但是另外许多人就要失业，就要去当妓女，福利事业也得削减。

有人甚至说，美国目前的经济危机是故意制造出来的，搞一点失业，好让工人听话些，工会没法子，只有接受减工资。妇女和少数集团也被迫放弃了他们多年为之奋斗的目标。由于社会成员的收入差别扩大，而经济危机的负担又转嫁得不平等，所以我们这个社会是越来越不公道的。加之，削减福利事业费用又迫使工人不顾一切找工作，降低工资要求，即使劳动条件很糟，也干。总之，失业队伍扩大了，大公司就可以压低工资，增加生产，提高利润，真是一举数得！

托夫勒答（下简称答）：这是一种看法。但是，这场危机是同时席卷几个国家的。要说这是故意制造出来的，那就说过头了，我们社会里没有这种能人可以控制得这样厉害。再说，这种说法，也未免忽略了许多根本性问题。

报纸上把目前的现象叫做衰退。不过，衰退一波及你本人，就不止是“衰退”了，就成了“萧条”了。我充分理解这个。我知道人们在吃苦头，人物越是小，苦头越大。

不过，别再去研究叫它“衰退”还是“萧条”了，这样反而掩盖了事实真相，一个劲儿谈论病状，却丢下了病因不管。

过去遇到经济萧条，总是基础工业先闹恐慌。停工，积压，破产，抵押品吃倒账，大工业纷纷关门。

这时，你根本看不到还有什么新工业起来的事。

今天呢？许多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如汽车、钢铁、橡胶、纺织这些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台柱子都好比强弩之末了。英国的汽车工人，北卡罗莱纳州和日本的纺织工人，都有不少解雇的。这是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电子工业、电脑工业、

信息工业、生物学工业、航天工业、环境再循环工业、代用能源工业以及某些服务业却正拔地而起，一天比一天发达，当然其中也不免有起有伏。

所以，眼前的现象不是什么所谓衰退，而是社会的整个技术经济基础在经历一次体制改革。这好比地震，地面都要变样子的。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否则，单靠一些小修小补，在银行利率、税收、工资、物价政策或是贸易关系上打点主意，是救不了我们的。罢工、游行、示威也没有用。

简而言之，我们是正在从第二次浪潮经济转移到第三次浪潮经济。这我还想进一步说明……

问：先不忙往下说。有些读者没有看过《第三次浪潮》，所以有些名词术语，你得下一个定义。

答：名词术语总难免有简单化的倾向，但也有好处，可以把今天的变革纳入历史的境界来看。

粗略地说，几千年以前，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游牧的，打猎的，打鱼的，采果子的，都成了农民，于是有了农村，我们所谓的“文明”也就诞生了。为了简单明了，我叫它第一次变革浪潮。

然后，大约在离今天300年左右，开始了第二次变革浪潮。一整套以工厂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机器，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方式，大众传播媒介，全民教育）在大约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取代了老的农业文明。我把这次普及工业化叫做第二次浪潮。

问：如你所说，第一次浪潮带来了农业，第二次浪潮带来了工业化的群体社会，那么，第三次浪潮带来的会是什么呢？

答：因为我们正处在新的革命过程当中，所以还难于为它下定义。好比有人生在工业革命的时候，虽然意识到正在

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总觉得很复杂，看不清；我们现在也是这种处境。猛一看，变化多极了，好像一群杂乱无章的东西，一齐朝我们压过来。

是电脑，但不止是电脑。是生物学革命，但不止是生物学革命。是能源形式变了。是世界上地缘政治形成了新的平衡。是有人要造男性中心社会的反。是信用卡+录相游戏+立体声+步话机的生活方式。是地方主义+世界主义。是打字员、信息工人、电脑理财的办公室工作。是要反集中，要搞分散。是一边遨游太空，一边自我探索。是一边推行浮动工时制利用机器人，一边眼见世界上的黑色人种、棕色人种、黄色人种的斗争气焰还在上升。这一切的冲击力量，排山倒海，一股脑儿压过来，把我们传统的工业社会生活方式砸了个粉碎。这里，最重要的是变革的加速度，它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

要使似乎出自偶然又互不相干的种种变革产生效果，我们需要一些强有力的新模式，这正是我在《第三次浪潮》里提出来的一种，以使我从无数变革中找出它们的相互联系的模式。我们也需要一些新的经济模式。

因为你如果不把经济同上边说的那些新的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是不可能了解它的。我们正在改革经济体制，因为我们正在改革整个文明体制，而经济只是它的一部分。

问：照你看，是什么弄得现在的经济走下坡路？

答：对于当前的经济危机，有人归罪于生产率低，有人归罪于工人懒，有人归罪于管理不力。有怪福利太多的，有怪投资太少的，有怪劳动道德太差的。也有怪日本进口货的，怪美国利率的，怪阿拉伯人、黑人、犹太人的。还有怪外国来的工人，得意忘形的资本家等等。马克思主义者呢，

他们一口咬定这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好像马克思主义者自己那里的经济没有危机似的。

上面这些诊断都不符合事实。

我的主张，就其涉及经济的那一部分而言，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当前的危机不是重新分配的危机，不是生产过多或者不足的危机，或者生产率低（无论作什么解释）的危机，而是**改革体制**的危机。原因是：老的第二次浪潮，也就是工业时代的经济垮下来了，第三次浪潮的新经济出现了，它运行的原则是不同的。

而第二次浪潮当中常用的药方（不论来自右翼或所谓左翼）现在都不管用了，只能加深危机。

问：很少人会否认，形势确实是在变。正如你说的，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一场老式的资本主义危机，而我们的很多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了。但是，要读者深入了解你的观点，你还得说得具体一点。譬如，你所谓第三次浪潮的经济，跟第二次浪潮经济究竟有什么不同？

答：我可以粗线条地说一说。但是先要划定一个范围。

我谈的变革是全球性的，波及到许多国家。这种变革是革命性的，不是狭义的，只限于政治性；它带有足以引起一场全面社会改造的意义。

这个危机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它是**工业社会**的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都波及到。从历史角度看，第二次浪潮文明创造的经济现在是危机日迫，接近生命的尾声了。尽管我们看到这种经济在许多地方如南朝鲜、巴西、墨西哥仍然发挥作用，但是，开创和传播工业时代的那种文化、技术力量，现在已经筋疲力竭了。

新的力量不断在世界上涌现，推出一次崭新的第三次变

革浪潮。

大烟囱快成古董了

问：我们要具体例子。

答：拿大规模生产来说，工业时代最典型的东西莫过于这个了。但是，我们岂不是在日渐离开大规模生产、大众消费的经济，而走向我们所说的“非群体化”的经济吗？

在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制度下，工厂成批制造几千万、几万万一模一样的东西。第三次浪潮呢？大规模生产被它的对立面——非群体生产代替了：短线生产，由买主定规格，逐渐制作，立足于电脑和数控设备。有时我们也大量制造同一种部件，但是最后配成的产品大多也是个别订制的。

这个情况可是非同小可啊。这样，不但产品多样化了，而且生产程序本身也变了。大烟囱，这个工业生产线的社会的标志，快要成为古董了。

我们以为我们还处在大规模生产的社会里，其实在我们经济当中的先进部分，这种生产方式也已经过时了。有一种想法，以为我们大规模生产的这一套老办法可以无限地用下去，这是没有看到工厂里实际情况的缘故。

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生产多样化和生产规格化之间并没有成本上的差别。实际上，很多工业的问题是，一定得搞个别订制的办法，否则没有出路。这同第二次浪潮时候要求划一正好相反。

可以说，这简直是辩证地回到了工业社会以前的“一件一个样”的生产，不过，现在是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之上就是了。

在分配制度方面，也看到完全一样的趋势：市场越来越

分化，开办了直接邮购、专用品商店，甚至实行了以家用电器和电信购物机为基础的各种送货上门的办法。现在的人一天天各不相同了，其结果是，原来划一不变的市场，现在逐渐分裂为小型，而且在不断变化。

大规模生产和大众分配再也不是“先进方法”，而是落后的方法了，这真是一件革命化的大事。整个经济正在“非群体化”。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历史性的变革。这是超越大众社会以外的新天地，可怜我们一些因循守旧的经济学家还没有注意到它呢！

如果你不把这个非群体化的根本因素考虑进去，你就没法好好处理失业问题、总需求问题，乃至政府工作问题的。它是继工业革命之后，市场经济性质上最重要的一次变革。同时，在“非交换”、非市场的经济领域里，也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

我们还看到，自用物品的生产（不进行交换的）也在发展。第三次浪潮的经济不单“非群体化”了，而且还包含一种值得注意的新事物，其基础是我称之为“自产自用的思想”。

生产者在哪里？

问：那是什么意思？

答：现在，所有的政府都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不爱付税了，他们采取以物易物、以劳务易劳务的办法，或者偷着干不入账本的“月光活”〔兼职工作——译注〕。经济学家十分重视这个发现，因为它很影响税收。这叫做“地下经济”，交换制度里看不见的一本账。

但是，还发生了另一种情况，从传统的眼光来看，更是

重要。

原来，有很多人生产的东西或提供的劳务并不是要卖的，也不在互易，而是归于自用。不是什么“小商品经济”，而是生产者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生产。我叫它“自产自用”。它改变了消费者同生产过程的关系。它目前是以“自己动手”代替买卖的形态出现的：生产者从市场买进工具、材料，但是在交换市场以外来进行制作。“自产自用”也以各种各样的自助小组的形态出现。

至于服务业部分，那种可以称之为“合作生产”的例子就更多得不可胜数了，这就是说，消费者或者别的第三者也在生产中插一手。

我们最熟悉的“合作生产”的例子是汽车加油站。过去站上工作人员加油，车主坐在车里。现在很多油站是由车主自己下车加油。买主做了一件过去卖主做的工作。结果一样，但是这个结果是由于消费者的合作而得来的。

由于我们逐渐向信息和服务这两个领域靠拢，所以，这里的界限就不大分得清了。譬如说：政府机构宣布一项消灭农业害虫的计划，但能否成功要看农民是否采用一种新的办法。这时，有一家电视台播放了关于新办法如何如何有效的节目（并没有向任何方面收费），因而提供了必要的信息。

（否则，那个政府机构也许得花钱散发传单，或者派人走访农户。）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名副其实地把这个电视节目看作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这家电视台就成了这茬好收成的一位合作生产者了。

总而言之，消费者和第三方也在做由生产者做的工作，因此过去那种泾渭分明的界线变得模糊了。

由于我们正从工业时代经济转移出来，因此，关于由谁

来提供信息，什么样的信息，给谁，代价如何的问题，关于生产者把一些什么样的工作留给消费者来做；关于消费者如何在市场之外为了自消的目的而进行的生产或劳动——这些问题是越来越重要的了。这些问题影响了生产的定义。今天我们的经济领域里充满了千百万无案可稽、无迹可寻的生产者。

因此，除了经济走向非大规模化之外，我们同时还在变换生产者、消费者和第三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总之，整个制度正在经历一场体制改革，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呢。

锐不可当的新工业

问：那些所谓新的工业，在你的第三浪潮经济当中，占什么地位呢？

答：我们以新型的第三浪潮工业来取代第二浪潮的大规模制造工业，这决不是简单的替换。新的工业跟旧工业有根本上的不同。

问：当然，会有很多新产品，新技术，但是，目的还是一样，社会关系也脱不了老一套。那么，这些所谓“第三浪潮”工业，难道基本上不是老样子吗？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罢了！

答：不能这样看，因为这两种类型的工业之间有一千种不同。产品不同，人员不同，组织结构不同，作风、文化不同。它们的最高最重要的层次，知识层次不同。新的工业要跟过去彻底决裂。

“第二浪潮”工业应用的是重体力技术：冲啊，锤啊，压啊，钻啊，敲打啊，切削啊，把原料弄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这些基本的制造程序是模仿人类的感官动作而设计出来

的，即使是山洞里的原始人也会切东西、削东西的。工业社会（的本质意义在于）扩延了人的体力和敏感，制造出了各种机器。

而“第三浪潮”工业是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进行的。我们现在不必敲打东西了，我们对材料本身打主意，经过程序处理，使它变成我们需要的样子。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分子或是亚分子方法的处理，创造出全新的材料来。我们不再发明那种单一目的的机器来不停地敲打材料了，而是赋予工具以智能，使它很快随机应变，用便宜的成本制造出各种不同的产品来。

如果说，这也是模拟人类的一面，那就是模拟了人的思想，而不是筋骨，新技术不是扩延人的气力，而是扩延人的智力。

结果是：“第三浪潮”的新工业带来了与前大不相同的社会、组织、文化、环境方面的影响。它们不同于它们所取代的大规模制造工业，正如激光不同于撞墙用的大铁锤一样。

问：照你看，有哪些这样的新工业呢？

答：“第三浪潮”的工业范围很广，从电子、激光、光学通讯到生物信息、代用能源、海洋科学、航天制造、生态工程、生态系统农业等方面的工业。这一切反映了人类知识的质的飞跃，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到日常经济生活上了。

你如果把这些新技术同新的非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程序联系起来看，同生产者、消费者、第三方的新的地位联系起来看，你就可以看到当前改革经济体制这件事意义之深远了。

但是我们眼前还没有看到什么。只有等到它们会聚到一点的时候（在电脑、通讯部门已经见到苗头），我们才会感觉到“第三浪潮”技术基础的全部力量，这是“第二浪潮”

的经济体制所不可能有的。

在目前的历史时刻，世界上忽然跑出这么一批新工业来，这就难怪好多国家的经济都一下子跌到危机当中去了。

地区与国家之间

问：我们以后再回头来谈这些新技术是不是一定就是新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先兆。现在先让我们来看看你另一个有争议的论点。你在文章里说过，国家经济这个东西可能也过时了。这是为什么？

答：这是目前在进行的改革体制的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在工业时代，我们从小企业供应本地区的格局发展到大公司统筹全国的格局，为什么能够办到这一点呢？因为当时有了新的工业技术、新的交通和通讯系统，可以把全国联成一气，还可以利用为全国性分配机构效劳的大众媒介等等。

临到近几十年，出现了“多国公司”这种东西。这时，由于技术力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国际金融系统为了迎合庞大的多国公司而进行了改组，又由于电脑和新的通讯系统也就了位，因此，世界生产总额当中越来越大的部分，都纳入了多国性市场而不是一国市场。

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同时发生了另一种与此相反的趋势：从全国性生产转向小于国家范围的生产。看看今天日本的九州，或者苏格兰，或者魁北克，或者得克萨斯州，我们发现，那些地方的地区性经济，其庞大复杂的程度，决不亚于几十年前这些地方所属国的全国性经济。

由于文化和技术趋势的原因，现在已经有可能专为本地区或者本城市的市场生产某种商品了，这种事以前是办不到

的，除非得到全国性市场的支持。

加利福尼亚州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当中第七或者第八位最大的经济实体了。纽约州，得克萨斯州，从经济上说，也都是巨人，实质上具有国家性市场的格局了，但是它们在法律、税收、规章以及中央银行的措施等方面都不得不受到重重限制，而这些法律等等又都是从全国立场出发而制定的，照国家一级的办法来执行的。这些地区性的经济，将来是一定会逐渐摆脱国家经济的框框，要求走自己的路子的。

与此同时，地区性经济也变得更加多样化了。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现在文化领域里的地方主义越来越厉害了，从诗歌到烹调无不如此，当然还有政治。

问：，不过，大多数分裂运动，譬如说加拿大和西欧的，首先是由于文化原因啊。

答：不错，我们绝不能低估文化因素，譬如比利时、加拿大国内的语言纠纷或是法国、西班牙国内的种族和历史问题。但是，这些地区经济越活跃（或者快要活跃起来），自治的要求就越强烈。苏格兰有北海石油，魁北克（有没有根据且不说它）认为可以卖水力发电给美国新英格兰地区。

关键在于，不管我们是否把这些地方叫“地区”或“民族”，总之，它们是离心的，不是向心的。这就是说，要从中央（华盛顿的也罢，东京、巴黎、伦敦也罢，莫斯科也罢），从国家的角度来操纵它们的经济，是越来越不好办了。

国家经济政策的惯用手法，如国家税收、中央银行货币供应条例，更不用提国家计划了，都是为大规模生产、唯货是图的经济服务的，很粗糙、笼而统之的手段；是为了以国家为基点的经济而设置的，何尝考虑到现在这种多国性、地区性（甚至地方性）经济大有凌驾国家经济之上的局面呢。

总之，用来应付非群体化的经济，实在太不细致，太不敏感，太欠灵活了。

这对于资本主义的中央银行和社会主义的国家计划主持者都是一大难题，我称之为“肾上腺素问题”。我经常用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是医院。我们的经济害着五劳七伤的病，可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和政府（无论是相信金钱决定论的，或者福利国家论的，或者奉行社会主义的）却好比某些驻院医生查房，一路看过去，不管是断腿还是脑瘤的病号，都开同一个药方：肾上腺素。

今天，这种统一刻板国家政策，对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经济都产生了越来越危险的副作用，将来它的余波所及，还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信息的冲击

问：你已经用非群体化、合作生产、地区主义的观点解释了新经济。现在请你谈谈，大家常听说的所谓“信息社会”是怎么回事？

答：随着制造工业走下坡路，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的白领阶层和服务业有了明显的增加，这是有根有据的。当然，这个趋势会不会继续下去，还难说，因为现在办公室工作越来越自动化了。这里，我想指出，关于信息社会，有几个问题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忽略了的，但对于我们了解改革经济体制却极其重要。

首先，为什么会出现信息革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的看法是，它是同经济上的非群体化、社会上的日渐

多样化有紧密联系的。我不准备细说理论，只想指出：大众社会越散架子，我们的非群体化就越厉害，经济就越差别化，因此，就更需要大量交换信息来维持这个体制的完整。

所以，在我看，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销售的垮台，不但是信息革命促成的，也是助长信息革命出现的一种因素。两者好比电子晶体片不同的两面。

非群体化是信息革命关键起因之一。其结果是一场革命。

问：你说“革命”？难道你认为，只因我们用了一些新的信息技术，就会使财富分配、权力分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吗？

答：权力的根本性转移，财富的分配，这些都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但是并不一定发生在我们平时料想的社会断裂层上。革命这个字是站得住的，因为新出现的事实把许多老想法都推翻了。

马克思讲过“劳动价值说”，我们现在大可以搞一套“信息价值说”。这样说的意思是，拿传统的“劳动三要素”来看，土地、劳动、资本，都是有限度的。譬如，我用你的一亩地种麦子，你就不能同时用这亩地了。我用你的劳力、资金，你就没法同时用它了。还有，劳动是可分可合，也可以严格管理的。信息可就不一样了。

过去的生产活动里边，也是有信息这个成分的。就是做一把石头斧子，也需要一定的知识。马克思在谈到随着技术进步而变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候，承认了知识的重要。但是，当前的情况是，信息已经成为绝顶关键的因素了，跟其他因素都不一样了，从辩证观点看，甚至可说处在对立的地位。

我也可以用。实际上，如果你我一起多的信息来。信息，不像别的资源，它”掉的；它是一种生生不已的东西。

可以把老生常谈的许多经济理论甩到一

足，那就考虑一下信息对工作和家庭的

处，千百万种职业就会从受上边控制的近的工作地点，甚至挪进你家里。对当反其道而行之的事，现在可多了，这又

回家运动

不谈信息的冲击日后可能带来一些不好上边所说的，是否就是你所谓的“电子

《第三次浪潮》1980年出版时，“电子家是无稽之谈。两年以后呢，《商业周刊》对劳资关系计划产生了重要作用”。有预言到90年代中期，美国至少会有1,500家里干的。果真如此，对我们经济体制的

遇到验收计件成品会不会很麻烦呢？而的社会联系会怎么样呢？人不是总是需别人的社会交往的机会吗？只要工作场所那种共同劳动的社会因素不是可以起到积

极作用吗？再说，有些人也怀疑，老板会不会答应这样做，因为他们就没法严格监督、控制了。

答：这方面的批评意见往往互相抵消。一边说，老板是不会让雇员在家里干活的，因为没法监督，要控制工人就太困难了。另一边说得刚好相反：机器监督起工人来，比现在还要周密呢。

实情怎么样，恐怕很大程度上要看工作是什么性质的，此外，还得看在“电子家庭”里做工的人怎样来设法保护自己。

不要忘记（可是往往被忽略），这些人并不是刚从封建庄园里跑出来的不识字的工人。他们是眼高手巧的工人。他们说不定还会利用家里的电脑、录相设备、电传通讯设备来组织一些新的联络网，“电脑同业公司”，新的职业联合会，以及其他自给、自保的团体呢；他们也可能采取新形式的集体行动，“电脑罢工”之类的事将来我们可能也会遇到。其实，我倒还是担心那些留在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人的状况。

工会不应该反对在家干活的办法（现在有许多工会往往反对），而是应该多动脑筋，想法子来制定人的价值标准，并且帮助家庭工人组织起来。

至于怎样使工作社会化这个问题，只要一提到“电子家庭”，总是要冒出来的。

不用说，人人都需要社会交往。不用说，现在大多数工厂、办公室里的社会交往情况并不高明。其实，人是历来都需要同别人交往，也一直在这样做，早在工厂、办公室出现以前就这样在做了。难道我们真以为世界上多数人从来没有跨进工厂、办公室，他们就没有人与人的交往，就没有友

谊，没有温暖了吗？

恐怕情况恰好相反。工厂生产是破坏而不是丰富了人与人的联系。我们过去不是经常批评工厂生活跟社会不搭界吗？现在，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等到了一线新机，却又说工厂才是最理想的！真是荒谬！

此时此刻，正有千百万工人晚上回家，一屁股坐在电视机前面，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气氛。但是，如果人是在家里工作，那么晚上一完事，多半就想出去串串门子，看看人，社交一番，会会朋友，参加一些集体活动。

我们住在郊区的人，都是每天上下班，早出晚归，所以这里简直象是社交的墓地。而“电子家庭”呢，不但不气闷，还能为街坊活跃气氛呢，因为在家干活的人一到晚上肯定会出来参加当地的演剧、教会、政党、联谊会这类活动的。他们跟厂子里、机关里的人的社交来往也许减少了，但是，跟家里人和街坊的关系却密切多了。

所以，我不认为“电子家庭”会带来社会隔绝的现象。这样说，太简单化了。我也不信将来只有一种统一的模式。肯定有人几天上班，几天在家工作。也有人去办公室工作三星期，然后回家干一星期，不受电话干扰，心无旁骛，好一气把事情做完。我想，有多少不同的工业、产品、活计，就有多少不同的工作安排。附带说一句，这对于现在不得不处于社会“非生产”人员地位的老弱病残，可是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我相信“电子家庭”确实可以创造出崭新的、更牢固的家庭关系、邻里关系。

很多妇女，有的因为经济困难，有的只嫌在家闷得慌，一直想找工作而不得其门，这种情况今后当然还会继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家里现在变了，成了工作教育和其他活动

的场所了，不那么空荡荡，不那么寂寞了。

还有一点可以说明：美国国内有35万家由妇女经营的家庭企业，从托儿、包伙食，直到编制电脑程序、建筑设计、担任企业经营管理的顾问等。

这是经济领域里的一片不为人所知的小岛，做的生意合计足足有几十亿元。它们从来没有使用什么技术。现在，一下子给它很多便宜的电脑、电传、录象等等设备，你看它不爆炸起来才怪呢！

大家应该定定神，从历史眼光来观察一下这整个问题。当年的工业革命把在家挣钱的活计挪到了工厂、办公室，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家庭生活。它引起了教育退出家庭。它造成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群众性的上下班拥挤现象。它塑造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生活。

从这个情况可以看出，如果把相当大量的工作挪回到家庭里去，当然也会引起种种强烈变化的。

问：你有那么大把握，认为这些事情肯定会发生吗？

答：谁也不能打包票。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压力是一天比一天加大了。

首先，长期以来，能源的价格涨个不停。每次交通费提价，老板们都不得不相应加工资。他们有时也抵挡一阵，但是要工人上班，就非得多给车贴不可，这是工资结构里规定死了的。

其次，早来晚去的上下班制度还有许多看不见的费用。公司把雇员集中到一处工作，这就要花地产钱，要付很高的税、工资、维修费，往往还得准备食堂、衣帽寄存室之类，如果在近郊区，还必需解决停车的地方。总之，为了应付上下班问题，就得搞一整套后勤设施，而这一切费用又在漫天

飞涨！

但是我们都知道，相比之下，电传、电脑、录象设备以及其他所谓“遥控上班干活”的工具，却都在落价。所以，图上两条强大的经济曲线，快要交叉碰头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在担心“生产力”问题。怎样提高它，有各式各样的计划。

毫无疑问，最有害于生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一早一晚把千百万人在路上来回折腾。浪费时间，消耗精力，白烧几百万桶不能再生的燃料，还污染环境，还增加拥挤，还造成天晓得有多少的问题！而这对于工人，代价就更大了。

我们担心在家干活对人的影响。但是，早出晚归的上下班对人的影响又怎样呢，对多数工人来说，上下班实际上是没有报酬的一部分劳动，沉闷，寂寞，一去一来几个小时同社会隔绝！多数人都厌烦透了。你倒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摆脱这种生活！

过去工厂里多数工人靠体力搬东西，所以少不得要上班干活。现在“第三浪潮”的工业一天天扩大了，很多工人老远跑到厂里，不过是去处理信息、意见、数字、程序、公式、设计、符号这些东西。因此，如果把信息送到工人那里，而免得工人跑去找信息，那岂不是节省得多？不单省钱，还可以节约能源呢。

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变化，也是同在家干活的思想相适应的。譬如：恢复家庭生活的呼声，力求分散化（说到分散化，什么赛得过在家干活？），反对强迫流动（现在调动工作就不必搬家了！），担心环境污染（最大的污染是集中生产制），等等，等等。

把上边说明的种种压力加在一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

么我认为把某些工作挪到家里去做，是呼之即出的事情了。再说，你也不能孤立地来看这件事，而是应该同其他一些情况联系起来看，譬如：生产、分配里的反群体化，加强区域化；信息的地位日见重要；一些崭新、史无前例的工业的出现；国家经济管制机构的失灵；合作生产和非市场生产的抬头；以及其他许多可以同回家干活的想法互相呼应的变化。

我们正同时在各条战线上对整个经济体制进行改组。毫不奇怪，我们的经济词汇已经陈旧过时了。我们有些经济地图已经不再能反应实际的地貌了。一个新的“第三浪潮”经济正在形成之中。

问：就算我们接受你的说法，说我们正在从根本上改革经济体制，也还另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如社会正义、公道原则、人道主义。这场变化恐怕要几十年才能完成。在这之前，又怎么样呢？

那些在变革中遭遇困难的千百万工人怎么样？穷人怎么样？妇女和少数集团怎么样？老年人呢？再说，我们难道不担风险，搞不好会弄出一个更不民主的社会，让少数知识界做优厚的工作，让其余的人扛力气活，过无权无势的生活？你怎么能保证你的“第三浪潮”经济不把知识、管理、科学界的人放在火车司机的位置上，而让剩下的我们仍然只是烧火添煤呢？跟从前一个样儿，一身臭汗，累得要死，任人吆喝呢。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先探讨一下未来的工作。

上 编：预 测

2. 将 来 的 工 作

陶 宜 译

将来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都由谁来干？我们是不是在走向这样一种可怕的幻境呢：2%的人使用机器人去干全部挣工资的活儿，而98%的人却没活儿干。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工厂开始引进自动化时，就有人预言会造成大批人失业，理由是：充分就业也办不到了，甚至也不适当了。有些经济学家呼吁，要保证全体工人，无论有没有工作，都应该有一份最低的收入。

然而，由于劳动力的组成发生了变化，50年代和60年代的那种恐慌消失了。在许多国家，制造业的活儿虽然越来越少，却新添了千百万份白领工作和服务性工作。

今天，人们对日益扩大的技术性失业重又产生了恐慌，而随着办公室里的自动化飞速发展，白领工人这次大概不能再那么逍遥自在了。

这一次，工作从哪儿来呢？

工作本身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问：你说我们的经济正在进行一次大变革——社会机构和社会价值也同样发生了大动荡。但是，问题仍然在于：得到好处的是谁呢？

技术上起了变化之后，各种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又会怎样变化呢？难道在资本家、经理跟职员、工人、男工、女工、白人、黑人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吗？西欧国家眼下有近3,000万人失业。其他上亿的人一辈子干的都是不堪忍受的活儿——可是有人说他们走了运！更严重的经济危机还在头里呢。世界其他大部分地方，情况更是糟得不得了。

但是，虽然如此，你倒好象挺乐观，这为什么？

答：如果就字面的简单含意来说，我绝对说不上是个乐观派。因此我认为，我们距离一场更大的经济灾难可能只差几毫米了。至少，从1975年发表了《关于经济痉挛症的报告书》以来，我一直是这样说的，可叹的是，这本书里说的银行倒闭、工人解雇的新闻，今天读起来仍然挺新鲜应时。

但是，目前这场危机，同过去任何一次不景气都不一样。它不是1933年大萧条的卷土重来，产生的原因也跟过去完全不同。如果我们想对付它，就需要了解它的特点是什么。

这次危机和过去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一场总崩溃，而是一次大变革，一次重整山河的激烈变化。如果我们抓不住这个事实，不立即对明天的经济纲领作出规划，我们又怎么能设想处理好种种问题呢？我们需要有新的概念。

我们谈就业，可是连新社会里这个“业”字究竟指的什么都不知道。说实在的，今天的所谓就业、失业，都跟过去的意义不同了。

问：那么，你说的“业”（工作），是什么意思呢？

答：我总是对“交换经济体制”里拿工资的工作和“非交换经济体制”里无偿劳动在思想上有所区别的——后者，我称之为“自产自用”。所谓“自产自用”，我指的是妇女（男人也罢）抚养孩子……男人（女人也罢）扩建住房……自己种蔬菜，自己做衣服，或者自愿到医院义务劳动这一类的事。他们生产东西，提供劳务。他们是在工作，但不是为了挣钱。“自产自用”在新型经济里是个关键因素。不过，为了说明问题，现在先集中谈“有偿劳动”——也就是多数人一提起职业就想到的那种内容。

问：你是说，工作这件事本身也在起变化吗？

答：我跟“纸上谈工”的那些人不一样。我在厂子里干过多年脏活累活，蓝领工人的活儿，力气活儿，装配线上的活儿。我参观过世界各地的工厂。我去过一些当代最先进的工厂、办公室，并进行过研究。

这一切都使我相信，我们大家心目中的“工作”概念是过时了，这些概念原先是亚当·史密斯和马克思关于劳动分工和异化问题的理论的产物，后来，又跟赖特·米尔斯的关于办公室工作性质的著作有关。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一个劲儿用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或雷纳·克莱尔的《给我自由》这两部电影里的内容来套今日的“工作”。上边说到的种种想法，批评当时的情况都很确切，不过，它们只适用于传统的工业时代，却不适用于现在迅速发展的新体制。

我们都知道，过去传统制造业工厂的分工，繁琐得要命——今天也还是一样。

长期以来，这种工厂式的工作方式也搬进了办公室：人人重复干一件小事，毫无整体感，也没有能工巧匠的自豪感，更谈不上发挥独立见解和创造力了。

现在，恰恰是这类工作——缺乏人性的工作——越来越吃不开了。

使我不断感到吃惊的是，总有一种怀旧倾向，想保留老的工作方式——而这种怀旧的人往往是那些从来不需要动手干活的人。

问：照你的说法，好象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

答：当然不是这样。即使在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也还有千百万劳动者（从装配工到打字员）陷在这种倒霉的工作环境里呢。

对于未来的工作来说，关键在于认识到机械、重复、分工过细的工作，那样的效率是不高的。这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是早已过时了的。无论公司、工会、政府怎么努力，这类工作总是在走下坡路。我们大可不必为它们伤心落泪。

替代它们的东西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早些时候我谈的改变经济结构的一部分。

随着“第三浪潮”这部分势力的扩展，工作的类型也要完全变样的。

已经出现了（或很快会出现）各种新的职业，从医院的扫描*技术人员到资源循环利用者、语言识别器维修人员、建立并协调家庭生产的人员，到从海洋开采锰矿的人、材料设计者、安装太阳能光板的人、海底考古学家和掌握纤维镜片线技术的人、太空实验室的建筑师、卫星直播节目的主持人、有学问的理论家、录象专家以及电视会议顾问，等等。

这类新型职业很少（可说绝无仅有）用机械性、泰勒**制的劳动（这是过去大多数工作的特点）。

问：其实，我们过去一直都有各种不同的工作。不过，你上面说的一些倒尽是新奇古怪的玩意儿。普通一点的活儿

又怎么样呢？为什么人们不可以对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来一个区别对待，只拣那些有利于保存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分工制度的那一部分拿来用于生产呢？人们会不会因为忙于照上面办法那样做，而根本不去理会那些具有解放意味的新技术了呢？

答：当然啦！谁也不愿意放弃权力。下至工头，上至最高的经理人员，都想保持老式的劳动管理制度，因为同自己的利益有关。但是，形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了。在传统的第二浪潮工业时代，割裂、重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公司有利。今天，这类工作让电脑来干，往往又快又好，而机器人还可以干危险的活儿。老式的工作方式越来越不赚钱了，生产也越来越下降。因此，就激发了一股势在必变的念头。

不久以前，我到过硅谷一家电脑公司的组装工作间。它不是生产硅片的，硅片生产仍然主要是按照第二浪潮的方式组织起来：一排排工人（多数是妇女，亚洲人）仍然在干可怜巴巴的重复性的车间活儿。那里仍然是在群体性生产。对比之下，我参观的这家公司是利用生产出来的硅片，加工制成产品，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

它是典型的“非群体化”的生产方式。物质环境清洁又安静。装配室里光线亮堂，气氛愉快，工作台上到处是花草草，还有家庭相片和记事本。工人们有小收音机，有的还有“沃克曼”牌立体声音响组合。

• 正电发射 X 光的扫描人员向我们提供了大脑中流动的能量横剖面图象——译注

•• F·W 泰勒（1856—1915），美国人，工厂管理，劳动效率的专家——译注

这里的工作跟人们想象的恰好相反。装配人员不是翻来复去干同样一件小活儿，而是每天在极少数的工作单元里完成大量复杂的操作和试验。这里完全看不到机械的组装线。

我并不是说他们的工作全部都那么轻松愉快。当然不是。但是，它和老式工作的对比，太突出了。现在只有这类第三浪潮工作在发展，而第二浪潮那部分工作正在一天天缩小。

在第二浪潮工业当中，你得到的是解雇，降低工资，各种好处可望不可即，工人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等等。

在第三浪潮工业当中，大家的共同话题是谈雇员如何参与决策的制定，谈如何扩大工作范围，丰富内容，而不是越分越细，谈如何灵活掌握时间而不是严格的上下班制；谈关于自助食堂之类福利事业（工作人员可以有所选择而不是铁板一块的东西）；谈如何鼓励创造，而不是盲目服从。

别开生面的工作方式

问：可是，你所说的这种装配工能有多少？你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就不知有多少别样的，譬如台湾的女工，是在喘不过气来的车间里生产零件？就是在美国，又有多少完全失业的工人呢？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只能安置一定数量的高级技术人员。要想让每个人都享受你所说的条件，那就不仅要改变生产制度，还要在组织、教育和社会化方面都进行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的阶级结构就得压缩，要使多数人在一种相当合作、松散的结构里成为某种专业或经理人员才是。就算这种做法对头，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进一步提高知识并分散权力。那些目前身居优势地位的人，很可能要

抗拒的，他们会自动放弃吗？此外，你所说的一些高级技术工业中有更富于人性的条件，恐怕主要指的也是那种可以提供高速生产和超额利润的车间的功能吧？

答：不错。相对来说，新的高级技术工业的利润是要高一些，单凭这个事实就能使它更容易发展。而高级技术人员的缺乏，又使那些有高级技术的人奇货可居。这一切都是事实。可是都不足以说明眼前发生的事。要这样来看这个问题：在第二浪潮工业时代，利润非常高，然而工作却是残酷、悲惨的。事实上，工作的残酷性直接转化为利润了。你叫工人吃的苦头越大，你得到的利润就越多。

在许多第三浪潮的公司里，情况正好相反。工厂里残酷剥削工人的做法不再赚钱了，它不利于生产。

第三浪潮的公司不能使用工人流汗来增加利润。他们的成功，不在于干得辛苦，而在于干得漂亮。汗水再不象过去那样可以挣钱了。

为了形象化一点，可以这样说：在老式的、“群体生产”的工业里，靠的是卖力气，而在先进的、“非群体生产”的工业里，信息和动脑筋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一切都因此为之改观了。

我还记得和松下公司创建人之一秋尾森田在东京的一次谈话。他说得很明白：“我可以叫工厂工人在早上7点准时来上班，一上班就生产。可是，我不能叫研究员或工程师一上班就拿当好主意来。”

森田懂得这个道理，其他的第三浪潮工业中有成就的人也一样。你跟“苹果”电脑公司的斯蒂夫·乔布斯，或是坦登电脑公司的金·特雷别格谈一谈，就懂得了。

第三浪潮公司要是出事，问题准是出在产品设计不行，

销售不灵，组织得不好，或是其他原因，而决不是因为他们
的雇员汗流得不够。

工作本身的特点既然变了，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就完全不同了。

新 型 劳 动 者

问：照你的看法，新型工人和老式工人究竟有哪些不同呢？

答：第三浪潮的工人更有主见，更有办法，不再是机器的奴隶。他们是典型的有技术或有专门知识的工人。正如工业革命以前的手艺人都有一个手用工具袋那样，新的“脑力工人”（如果你想这样称呼他们）掌握技术和信息，这就等于是个脑用工具袋。他们掌握的“生产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没有特殊技能的工厂工人过去所不可能具备的。

新型工人更象独立工作的手艺人，跟可以相互替换的装配工不同。他们更年轻，受过教育比较高，绝对厌烦老一套。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任务，不要头头管。他们要求有发言权。他们对于变化、朦胧意味、灵活作法很习惯。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力量，人数正在成倍增长。

由于经济的第二浪潮转入第三浪潮，由于出现新技术，我们也有了一整套新的价值观。这对雇员、政府政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工会等等，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问：我们可以同意，说社会上存在这种类型的“脑力工作”，它促成了更好的工作环境。毫无疑问，这类工人有某种程度的自信，要求（有时甚至已经得到了）一定的灵活性

和参与感。但是，有多少人是这样的呢？

由什么因素来决定，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能走多远呢？

你指出，技术革命和在生产中注重知识，是个关键因素。但是，现有的各类社会集团都想保持自己的相对优势，又怎么办呢？难道资本家可以不反对有人侵犯他们的地位和权势吗？他们能容许知识分子、工人有越来越大的自主权和发言权吗？眼下的专业人员和经理，难道不是在知识性工作以及它所带来的“优越地位”方面，小心翼翼地警惕其他人员来夺去他们的垄断地位吗？甚至现在，美国医学会也还在设法限制医生的数目。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类地方，经理们不是也反对工人过多参与公司的事务吗？

在你展望到的新工业里，基本结构有多大变化呢？雇员们不是仍然是雇员，不管个人或社会要付出多大代价，总得替公司赚钱吗？

总之，你真的发现了一种新的劳动场所，在那儿每个人在整个工业工程中都分担日常工作，同时也是平等参加管理的成员？还是，你实际看到的，不过是对现状的小小修补，知识分子化的工人多了一些，这是肯定的，然而，依旧是老板掌大权，大量普通工人照老样子干活？

答：我不是空想主义者。我并不幻想会出现一个什么十全十美的劳动场所，那儿人人享有平等的决定权，干同样的活，拿同样的报酬。即使能做到这点，我也不认为是十全十美的。这种体制，在某种环境下，也许会运行顺利，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就可能造成一场灾难。在这样的企业里，有些人可以干得很满意，另一些人可能恨之入骨。

一个好的社会应该能够提供最大限度多样化的机会——

例如，和你对口的工作，使你有所建树的工作，有些工作需要你参加意见，有些或不需要。根据我的经验，多数理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现在还在用第二浪潮要求大一统的恩想来考虑问题呢。

如果我们说的“非群体化社会”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很可能看到各种各样新组织形式爆发出来。不再有私人企业或国营企业或者是两者混合组成的经济了。我们很可能看到的是“电子合作组织”，宗教的和家庭的生产小组，非利润性的工作网，以及更多其他新的、各自为政的安排。

毫无疑问，这些机构当中也会有自营企业。就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超过一定规模的自营企业都没有成功的，可是，“脑力工人”容易被忽略的一件事是他们自己管理的条件比过去的典型工人要好得多，因此，形形色色各自为政的新组织形式就会大量扩散开来。

不过，就近期来说，尽管各国情况不同，我们基本上仍然谈的是国营或者私营的企业。这些公司将在不断增长的压力下，沿着减少官僚主义、削弱等级制度的路线重新组织起来。经济和社会进入第三浪潮越快，这些传统的组织形式的效率就越低。

至于说追求的主要目的——当然，公司都是追求利润的，但也不仅仅是利润。精明的公司不再追求最大限度利润了，不管密尔顿·弗里德曼是怎样说的，那是另外的问题，我们以后还要谈到。目前，我们只谈工作问题，因为我现在谈的工作性质起了变化这个特点，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

由于工作性质变了，你几乎可以看到同时出现两个明显不同的工人阶级——如果“阶级”这个叫法仍然可以用的话。

当然，工人阶级一直是有派别的。但是，工会、左翼以及激进运动的思想是始终围绕着团结、统一、联合行动、待遇平等、同工同酬、同样的杂项福利措施这些内容的。

在资本主义和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工业生产制度都要求标准的、一刀切的工人队伍，工会可说是在帮助雇主制造这种局面。无论情况是否如此，整个体制反正是压制多样性和个性的。马克思认为工厂制度本身促进了集体化意识，因此所有的工人最终会把自己看成是同一阶级的成员，都是“劳动大众”。

然而，目前发生的事却是辩证的反面——可以说只是头上戴着一顶马克思大帽子而已。因为，在经济起飞的那些部门里，你不再需要成千上万工人干统一、标准化、重复性的劳动了。新的制度需要工人善于随机应变，富有革新精神，受过良好教育，甚至带一点个人主义的味道。

这类工人在经济的先进部门里目前很受重视，工会不容易吸收他们（或她们）。这些人日后会创造自己的新组织形式：多一点交往联系，少一点整齐划一。如果他们真的参加工会，也会迫使工会在结构、实践和思想方面实行重大改的。

新的工作作风、新的价值观、新的多样性和个性化，是完全适应生产、消费、通讯、能源和家庭结构等方面的“非群体化过程”的。

事实上，其他各领域的变革无不影响经济领域的发展。因此，不能说只是经济在带动着这个体制的其他领域。

正如消费者不断要求订制的商品和特殊的服务那样，工人（往往就是消费者本人，一身而兼二任而已）在工作方面也要求得到各不相同的待遇。在第二浪潮时代，技术促进整

齐划一，第三浪潮技术是在迎合（实际上可以说是鼓励）社会多样化的要求。

这是一个靠自身力量越滚越大的现实。

论 报 酬 与 福 利

问：你是说，我们正在创造一种经济，只有受过高等教育、有特殊工作技能的人，才能在里面找到工作吗？但是，我们即使在某些工种的人性化方面有所成就，却使教育和整体经济把多数人排斥在外，不能就业，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答：要是我们建立起来的经济只是围绕着已知的技术转，或者只去搞劳那些善于讲抽象的理论、口齿伶俐的“知识官僚”，那就是一场悲剧。

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第三浪潮经济，即使有取得大量信息的基地，也需要各种各样的有聪明才智的人，而不是只需要纯粹的智囊。我相信，经济也会对其他技术提供刺激的。例如，我们需要大量的训练人员和进行再训练的人员，这都需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艺术，或视觉、制图和演戏的技术。我们需要对美学有研究的人，有审美和体育技能的人，敏感的管理人员，以及组织者——这就需要多方面的才能，只掌握已知的技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善于斗争的人、善于协调的人、从事文化交流的人员，等等。

以为任何社会、任何经济都能通过脱离实际的智商来管理，是荒唐的。这只是技术官僚们的宣传，完全不对。

问题是，怎样向所需要的大量多样化技术付给报酬。

没有一种文明对所有的技术一律不分青红皂白而付给同等报酬的，也不应该这样做。农业或第一浪潮文明给某种特

性或技能以报酬，特别是卖苦力的人。工业或第二浪潮文明则按不同技术付报酬。第三浪潮文明也嘉奖那些有特点、技能比别人高明的人。

无论哪一个时代，那些技术不佳、报酬不高的人，在社会上只好接受较低的职位，或者被迫进行斗争，来改变现有的报酬制度。我猜想将来也会是这样的。

这使我回到了过去的想法，这就是：用某种工资形式保证所有对生产有贡献的人都能得到最低收入。无论是通过消极的付所得税的办法（我想这是密尔顿·弗莱德曼建议的）或者沿着罗伯特·西奥博尔德这样的经济学家所制定的路线，我认为所有工艺高度发展的社会都只能向这个方向发展。这类制度不需要集中化或标准化，甚至还可以通过私人渠道办事。至于方法问题，我们是可以发挥高度创造性的。但是，如果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不能善处这个问题，他们就会面临爆炸性的社会矛盾。

问：但是，今天对福利社会的攻击，不正好把我们带到相反方向去吗？

答：关于福利我没有说什么。我说过，我们要对所有对生产有贡献的人给报酬。那完全是两码事，和福利制度不一样，和只对有工作的人付酬也不一样。我所说的，在本质上和上面提到的两件事都不同。

我所谈的一切，对旧范畴都不适用，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开明的还是保守的。

我不是说，要向社会上的非生产人员付报酬，像福利制度有时做的那样。

我是说，有很多人，他们为社会生产了财富和价值，而我们一般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却看不见。我指的是那些不被

承认的生产者。

例如，我在《第三次浪潮》这本书里曾经指出，很多消费者在交换经济之外对生产是有贡献的。他们为自己生产了真正的商品，提供了劳务，减轻了社会的负担。千百万妇女就属于这类人。他们为交换经济贡献了价值。只是由于她们在“使用”经济中工作，才从来引不起我们的注意。她们就是我所说的“自产自用者”。此外，甚至在交换部门之内，许多第三方面的人也在共同生产价值，但是也没有得到承认——譬如，刚才说到过的对发展农场生产有功的那家电视台。

“自产自用者”和合作生产者绝不是非生产人员。但是，他们的贡献人们看不见，因为我们是使用陈旧的、不公正的计算制度来衡量的。

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给一笔福利救济。我是说，我们必须承认真正对生产有贡献的人，给他们以报酬。事实上，我想，如果不这样做，我们是不能解决失业危机的。

七 路 失 业 大 军

问：你坚持说，我们正走向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可是，在这里，我们面对的却是各种问题中最老的一个——失业。为什么它和过去使我们吃尽苦头的那个问题不一样？我们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答：如果我们愿意付代价，就可以使每个人都有工作。譬如说，通过战争。它是经济上的氨基丙苯——但是，像真的这种药水一样，也是坑人的。

我们也能设置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出钱让人来干。经济领域里到处都有这类的事。苏联人是制造所谓“充分就业”的老手，他们通过简单快速的方法大搞官僚主义的“无效劳动”。

西方专治失业的解药一直是“生长”，至少从凯恩斯、罗斯福以来是这样的。可是，即使我没有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通货膨胀这些伤脑筋的事，只靠“生长”政策也是不可能消灭大幅度失业的。

因为失业问题不简单是个数量问题。它不只是有多少工作的问题，而是什么样的工作的问题。工作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谁来干？这是一个质量问题。要是你不面对质量问题，你就不能解决数量问题。

这种经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各种不同的技术，而技术又需要保持高速度的变化，而劳动力更是需要多种多样的。经济本身的差异也更大了，也更乱更动荡了。今天的经济好比出疹子，一哄而起。许多起飞工业的贴隔壁就是萧条区。因此，我们无法用简单的、一刀切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至于失业的起因，就更复杂了。

问：一个要独自养活几个孩子的失业的妇女，或者一个年过50被解雇了的汽车工人，他们对失业的感觉大概是相同的，即使原因不同。

答：是的，可是你不能只用一种药来治这种病。实际上，你是在对付半打以上完全不同的病。把这些病一律放在“失业”项下，就好比把癌症叫作“顽症”一样，我们的解救失业的药方，多数会引起后患，就像给病人进行全身幅射治疗一样。

事实是，我可以一口气举出7路有明显区别的失业大军来：

①第一路：结构性的失业。它是第二浪潮转入第三浪潮工业的时候所引起的，是世界范围的现象。由于旧的、传统的工业垮台了，或者搬到像泰国、墨西哥这类地方去了，这就在工业社会的经济里留下许多窟窿眼，使千千万万工人失业。

②这个大动荡的结果之一是：在国际市场上，国际贸易的压力、竞争、倾销、不平衡、突然失败和倒台都越来越凶了。于是制造了第二路失业大军，这是和贸易有关的失业。

③由于技术水平提高了，进行一定水平的生产所需要的工人越来越少，给工作问题增加了普通的压力。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有争议的所谓“技术性”失业。

④另外一种是由于纯粹地方和地区性的原因引起的失业（如当地人口过多，消费习惯改变，企业合并，生态问题，等等）。我们可以称它做“正常的”失业。

⑤再就是高于通常水平的所谓“摩擦型”失业。这主要指那些在变换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暂时失业的人。事物活动得越快，变化的速度越快，这类失业的人数也就会越多，而今天变化的速度是很快的。

⑥还有一种失业，几乎完全由于信息障碍所造成的。因为，劳动分工变得太细，相互换工作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少。如果说，过去多数工人干老一套机械性工作的时代，适应新技术还比较容易，现在要换一个工作就难得多了。这就要求信息体系比现在的要高级、复杂得多才行。如果做不到这点，就可能产生一种严重的、所谓“信息型”的失业。

⑦最后，是我把它叫做“医疗事故型”的失业。这是由

于政府政策干了蠢事而招来的不必要的失业。这些政策的原意往往是为了增加就业机会才制定的。

我认为，我们的非结构性失业的很大一部分属于这种性质。它是医生弄出来的病，可以弄死人的。不幸的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对医疗错误是不负法律责任的。

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更多类型的失业，各路大军都站在危机的十字路口，互有掺和。我列举以上这些，只是说明失业不是个单一的问题，有许多问题是相互交织的，极为复杂。

要记住，譬如我们说技术可以造成失业，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考虑的。在这种制度下，技术也能从别的方面提供工作机会。

其实，失业也能创造就业机会，譬如，失业一多，社会工作者、医生、警察都忙起来了，就业的人就多了。失业也会使某些工业里的工资水平发生变动，因而在低工资这一档里增加了就业机会。

我们每做一件事，都会产生生生不已的后果。而每一个后果又会派生第二轮，第三轮……以至无穷的后果。由于制度的“非群体化”，它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手头现有的各种模式都失去了过去的优势了。

无论如何，那种认为“失业”不过是加法问题、数量问题，与质量无关的看法，只是典型的、陈腐过时的工业时代的概念，是建立在假想上的，以为我们仍然在跟传统的群体经济打交道。

像经济本身一样，失业的原因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治疗的方法自然也要跟着复杂起来。因此，对付每一类失业都得根据具体情况。可是我们仍然一个劲儿地使用大路货的

抗菌素，而不愿意用“上等的”、对症的药来治病。

问：这7路失业大军当中，你认为哪一路最重要？

答：总的来说，失业无非是由于第二浪潮工业不行了，由于建立在新技术和新文化上面的新兴工业站起来了。这是“结构性”的失业。

在传统的衰退或萧条时期里，工厂和办公室关门，人们挨饿，直到原来的厂子或办公室重新开门，让他们再干上原来的工作才算了事。今天，在许多情况下，老厂和办公室永远都不再开门了，即使有机会重开，也不会再干同样的活了。这就是老办法不再起作用的原因。金融学家的办法，凯恩斯的办法，弗里德曼和加尔布雷思的办法，或者建立在纯正思想、自由企业、国有化、控制工人之类基础上的简单计划，都无济于事了。

重 整 思 想

问：那么，从现实出发，我们还能让今天这些“结构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吗？譬如说，炼钢工人……纺织工人……汽车工人……且不说千百万原先就没有工作的人了。

答：坚强冷静的人只能面对这个现实：许多这类被解雇的工人，是不会重新再吸收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或者第二浪潮经济部门的任何工作）上去了，而这些人当中的多数对第三浪潮的新工作又还没做好准备。

这就是说，要么退休，要么接受再训练，二者必居其一。

失业，实际上就是强迫退休。但是无论哪一种现代社会都经不起解雇这样一大批工人，让他们去吃自己的老本。大

量失业，又不给补助或津贴，一定会引起政治动荡。这个危险，谁都明白。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怎样来养活大批退休人员。

我们可以迫使公司用降低利润的办法支付它自己的超额工人。但是，解雇工人最多的工业，恰恰正是利润最低的工业，有的甚至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所以，如果我们无限制强迫他们维持自己的超额工人，他们只好用提价的办法，把这笔钱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去。

另一种办法是，我们可以使这笔费用社会化，让政府来支付工人。不管用什么方法，这笔钱最后总是要转嫁到公众身上去的，但用的是税收形式。这两种办法，无论哪一种，花的钱都得由多数群众来分担，数字可能是很可观的。

这就是为什么，只要有可能，就应该选择另一条出路：再训练。事实上，我相信，我们已经在大规模内进行训练和再训练了。所有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都得把资源投入到这项活动中去，无论是由私人来干，还是由教育系统、军队、传播媒介来干，或是几方面同时进行，反正这件事势在必行。

现在，当权派对这个问题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我们刚刚把一份报告书送到美国国会，提出：对再训练工作缺乏战略考虑“是对美国经济复兴的重大障碍”。我曾经和白宫的高级官员明确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即使在奉行自由市场政策的政府下面，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不能不有所行动了。

现在的问题是，在我谈到要为第三浪潮工业训练工人的时候，我指的不只是简单的职工技术。新工业是在新文化中工作的，又在工作中创造新文化。它们带来了新的价值观、新态度和新的生活方式。所以对失业的钢铁工人来说，想从

一般工厂跳到需要高度技术的新工业里去，可能非常困难。这不单是工作技术上的改变，也是文化上的一次飞跃啊。

就这个意义来说，训练是很复杂的事。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件事做好。而且这可能很费钱。

然而，比起简单地把这些工人往废渣堆一扔，发他们一辈子退休金，总是便宜得多了。

除非我们能帮助那些不断被挤出来的人，帮助他们不但进入新的经济，而且进入新的文化，否则，我们这个社会就要四分五裂。

让工业无疾而终？

问：照你说，我们面临的是经济结构上的基本变革，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顺利过渡呢？

答：从长远说，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份“工作”——这里，我们指的是交换经济中的正式、有偿、生产性的工作。

最后，我们也许需要探索一下“自产自用”这个人们自己生产自己用，目的不在出售或以货易货的做法。有许多途径可以使我們很快增加“自产自用”的生产，例如提供新工具、原料、社会和政治上对自产自用者的支持，以及某种金钱支持等。这类政策，听起来好像有点空想主义的味道，但是，不久就会在政治议程上占第一位的。与此同时，还有更多常规的事情要做。不幸的是，我们连这些平常的事也没做到。

拿70年代中期美国的卡特行政当局，或是英国工党掌权的时候，或是这些国家的左翼和自由党派来说，都是一样，基本上忽视了新的第三浪潮工业，只顾一心一意支持和保留

旧式的第二浪潮经济。

在美国，我们想花钱保住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英国，我们实际上是国有化了莱兰汽车公司；在法国、联邦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想方设法使这些传统工业的经理、工会和股票持有者称心如意。这是蠢透了的经济学。看不见正在进行中的大改组！这对人类的生命和努力都是一种浪费。

在辩论莱兰公司问题的时候，我推测英国政府是想花一笔钱（相当于所有莱兰公司工人7年的全部工资）使莱兰公司留在汽车工业里。依我看，有了那么一笔钱，再加上训练、新技术和其他帮助，那些工人原来满可以在7年时间里重新组织他们的生活和社会，而不必再倚靠汽车过日子。英国本来是可以创造出新的、更健康的工业和社会来的。

问：你的主要意思是说，作为政府的一项政策，我们应该自觉地设法淘汰那些正在过时的工业，不让它们混进新的第三浪潮里来，而不是听任市场力量慢条斯理地、一步步地为它们送终？

答：不错。即使是一时的帮助，我们也需要非常小心加以识别，当然，也有些例外。譬如，某种工业如果关了门，就会毁掉整个地区，那么，我们就很可能给它一个为期5年的过渡阶段，来缓和冲击。我们也可能为了某种原因，想保存某些公司，比如说，一旦出现国内或国际紧急状态时，他们可以作为快速扩展的基地。可是，我不明白，美国在钢铁或重型机车方面为什么要完全倚赖世界市场。这样做是愚蠢的。所以，我们也可能为了社会或其他的原因，保存一些特定的公司或工业。

我知道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政策，他们的理由也不全错。

主张自由市场的人提出质问说，政治决定是否一定好过让私人得利的决定？这话不无道理。看看法、英两国建造“协和”式飞机的决定吧！看看美国国会的世界油价下跌的时候向合成燃料工业投下的几十亿美元吧！一旦投资决定带有政治性，那些有关集团就会大肆活动起来。此外，工业政策只有在在一个国家有明确的模式可循的时候，才能最好地发挥——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那样。今天做决定可要难多了。

不幸的是，让一切只由那只看不见的手来操纵，也是不行的。

问：那不是直接打到了自由市场的脸上了吗？

答：我不是个纯粹的市场派。我确乎相信自由市场（其实从来也没有真正自由过）是一个很好的调节体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经济政治分家的非常有利的条件。市场也是一种可以分散大量经济决定的途径。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充分发挥想像力，比过去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来应付像失业、城市不景气、关心老年人、污染等之类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但是，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局限性——这是制度的一部分内涵。我们对待市场机制的态度不应该停留在理论上。市场不是宗教，它是工具。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包办一切的。

面对今天的失业，我们在创造性地运用公共基金以逐步结束某些第二浪潮工业的问题上，不应该再犹疑不决了。目的不是保持它们运行，向这些工业的经理和工人继续付工资，而是要使工业和地区的转化过程发动起来。

关键是转化，不是支持。我不会花一块钱来支持一个日见衰败的工业，除非（或者等到）这个工业同意制定规划使现有的技术和产品转化为重要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并有计划地对它的经理人员和工人队伍进行彻底的再训练。

最近《商业周刊》在一次民意测验中问大家：那些快完蛋的工业是否应该让它们“沉浮自便”？该杂志高兴地宣布说：多数美国人（占56%）赞成让自由市场“沉浮自便”，而不主张进行“保释性”的支持。但是这些办法却不是唯一的。“非此即彼”的观点是太简单化了。现在所需要的既不是盲目的“适者生存”论，也不是同样盲目的救济政策。真正需要的是帮助它们转化。

转化并不是个新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我们想把美国的战时经济转向和平时期的经济，那时曾经有过重要的讨论：“怎么办？”更近的一个例子是：当英国的卢卡斯航天工业通过雇员们说，由于军方减少订货，他们要解雇了，雇员们就自己制定了改变产品的计划，产品多少是可以用原有的技术和工人来生产的。据我所知，他们制定了转化的具体计划，改制运人的交通工具和电子医疗器械。

卢卡斯雇员们的想法后来没有行得通，因为教条主义的工会和同样教条主义的公司互相扯皮不休。但这件事是发人深省的，因为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它强调，转化计划（如果想实现的话）不能只由资方一家来定，而是需要由那个工业有关的工会、它的雇员（不同于这个工业的工会），还有它的原料供应者和主顾以及工业所在地社会各界的代表们参加，共同制定的一项战略文件。不久的将来，“转化”在我们的经济词汇里一定会成为一个关键字眼。

问：在一定意义上说，你是主张有关的人在转化过程中都应该有发言权——不仅限于老板和经理，工人、消费者和居民也得有份。可是，现在我们听到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关于大资本、政府在一起制定工业政策的问题。

所有你的著作都表明，你对计划是抱着一种模棱两可的

态度。一方面，从《未来的冲击》这本书开始，你一直呼吁要有长期性、战略性的思想。可是，你又强调分散化，多样化。你自己的思想是否也自相矛盾呢？

答：我在《未来的冲击》这本书的末尾说明过：工业方式的、集中化的、自上而下的机关化的计划，和那种比较开放的、比较民主、比较分散的（我叫它做“先行民主式”的）计划之间的区别。由于经济危机不断加深，我意识到，人们对战略计划的思想越来越愿意支持了。但是，我不能说我喜欢这个目前发展的趋向。

我在和一些大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经理们的谈话当中听到的是，多数人认为计划是有必要，而且不仅局限于公司内部。例如，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讨论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式的计划（我觉得这很滑稽，因为这些国家也是身处困境。在我看来，好象多数被当做“先进思想”的东西，不过是一些“老掉牙的模式”。）不管怎么说，今天美国的报纸充满了金融家、经济学家、激进理论家、多国公司的经理人员的声明，宣扬“企业—政府合作”的优点。有时，思想比较开明的、老于世故的经理们，也说应该邀请工会参加拟订计划的过程。

无论什么政府当权，这些主题毫无疑问都会在华盛顿得到支持。大公司需要它，政府也需要它，不管是否公开这样说。至于工会，论实力是可怜的老三，也希望上到台面上来。

虽然这比目前普遍存在的糟糕局面可能略有进步，可是它也让我害怕，因为是一种内部的“三方主义”。事实上，这就是20年代法西斯分子所玩弄的那套老把戏：“社团主义”。

这种模式在很多方面都不对头，而且危险。

首先，我认为，在我们正在建设的复杂的“非群体化”的经济当中，它在全国范围内是行不通的。

其次，它提出一种狂妄的假设，说如果能使公司、工会（在美国，只代表不到四分之一的工人，而且，代表的办法往往也是不民主的）和政治合在一起，每个人就都有了“代表”。事实上，没有人觉得自己是有了代表的，更何况由这类的庞大机构来代表他呢！

第三个问题就更深一层了。在这种内部的“三方主义”一实行，它就成了极端保守的力量，总是要求维持现状，或者支持任何现存的东西。那些生产莫名其妙产品的企业，尽管不兴旺，总愿意干下去，因为工会一要工作，二要会费，所以，即使世界上已经不再需要这类产品，他们仍然要企业继续制造。政府呢，也不想跟公司、工会吵架，能免则免。于是，那家制造小玩意的厂子就无限期地存在下去了，成为经济上的累赘。

所以，如果有什么计划的话，也必须分成大片来计划，因为，许多有关集团（从消费者、原料供应者和公众机关，直到不同种族、少数民族、性别问题、职业的社团等等）都会卷进这个过程，而基本计划又是建立在地方、部门和地区范围，而不是建立在全国水平上的。计划应该是长期的，不只是短期的，它还需要考虑所有像生态和工作质量等这类的非经济因素。

可是，说到头，还得老实承认，除了纸上谈兵之外，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件事办好。我们有许多地方做了试验，有些很有前途。新的通讯工具很有创造性，如相互作用的电缆，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怎样

给有关选区下定义，并不断重新下定义的问题，如何使它合法化，以及如何使整个过程和预算、税收的过程联系起来（不这样做，计划就会徒具虚名）。总之，我们必须为真立的先行民主“发明”一些办法和机构才行。

我不能假装说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这里有矛盾，确实如此。然而，有一件事我是清楚的：我们不能倒退。即使我们要同第二浪潮工业和工会进行一次大的较量，我们也得把主要重点放在发展第三浪潮经济上面。我认为，我们需要利用有选择的税务信用贷款和其他手段来帮助发展新工业。我们应该鼓励人们进行更多的研究、探索工作，为发放给这些领域里的小企业的贷款提供保证。在学校教室和少数民族区或犹太人区的商店前面摆上微型计算机并设指导员。^{*} 彻底检查教育制度，保留对环境的控制，一点也不能放松——这些都间接对先进的第三浪潮工业有好处，可以加速过渡的进程，因为新的工业比起旧的来总要干净、省力些，只有个别的例外。

为了渡过危机，我们可能宜不惜采用一切手段。除以上的措施外，还要加上大量的再训练工作。我们很可能还需要用津贴（直接的或是通过私人经济途径）来补助快速发展的服务部门。不仅仅是环境卫生这类的事，还有基本的对人服务。例如，由于人口老化，关心老年人将成为一个热门的政

-
- 美国国会曾通过两个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法案，一个是“苹果”计算机公司竭力要求的，该法案规定对向学校提供小型计算机的公司给以特许税。另一项法案是国会议员纽特·金格里奇（橡胶生产者协会）倡议的，如果哪个家庭为了工作或教育的目的买了一架家用电脑，就可以给这个家庭相当于税金数额的投资贷款。

治重点，不仅美国如此，在其他国家如日本，也是一样。事实上，它能提供就业机会。因为当群体生产部门当中许多被解雇的人不太容易留在第三浪潮工业里，但是在第三浪潮的服务行业里倒可能干出成绩来。此外，在对待社会发展的问题上（如帮助居民区和工厂城市过渡的服务中心或高级技术经济）也需要我们具有丰富的想像力。

我个人坚决赞成尽量利用私人经济成分来完成以上的任务。但是不管由私人还是公家来做，事情都得办好，否则就会产生普遍的绝望情绪，更不必说暴力了。

为了顺利过渡到第三浪潮经济，有许多步骤可以采用。我们最好现在就动手来做。

· 机器人来救命？

问：你谈到逐步结束老式工业。但是，难道他们不能用新技术改造自己吗？一些大公司不是正在这样做吗？

答：是说使工厂机器人化吗？不错，聪明有见识的公司是有可能依靠自己的努力进入新经济的。我知道许许多多公司都在这样做。但是，这不单是机器人的问题，还有其他好多问题。

没有什么简单的技术上的解决办法，因为陈旧过时的问题不单是涉及技术问题。

原则上，通过少依赖体力劳动，多聘请一些智囊人物，第二浪潮企业就可以使自己改造成能够活下去的第三浪潮企业了。这就是机器人和自动化要干的事。正如我们过去用能源代替体力劳动那样，我们现在正开始用广义上的信息来代替机器人化和自动化。

但是，要使改造成功，公司或者工业还需要做很多其他的事。他们必须从组织上进行改革，必须学会把工人当人看待，必须按规格改变产品和分配制度，必须订立更多的合同，必须重新估价垂直体系（它已经逐渐不中用了）。公司和工业必须向更小的单位发展，有更多的雇员参加。为了生存，他们需要做一些事，不仅仅是机器人问题。

问：那些由于变动而留下来的工人（被机器人替下来的工人而又没有条件立即适应你所说的新社会的那些人）又怎么办呢？

答：在我看来，这里有一条明确的道义原则。你是大公司，你遇到了麻烦？你是经理人员，你为什么没有预见到，及时加以防止呢？不然花钱聘请你干什么的？

为什么你等着外国的小汽车抢走你的市场呢？（即使当年经营大汽车利润确实大一些，即使当年油价便宜，这几年的形势也早已经看清楚了）为什么你让你的炼炉越来越退化？为什么你的技术失掉了优势？为什么你不搞新产品和新的服务项目？你今天吃苦头，怎能去怪你的工人呢！？

所以你对他们是有责任的。一个50岁的工人，在公司里当了18年的纺织工人或者汽车工人，他们都是有汗马功劳的，你怎么能解雇他们呢？如果公司打算重新装备，那么它就有责任也帮助它的工人重新装备。

问：道理是很高尚的。可是，这种局面下的经济学又怎样呢？情况越糟的公司，帮助它的雇员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它确实想这样做。

答：如果一个公司没有这样做的本钱，从机能上说，它已经破产了，应该受到破产的待遇。雇员们要求再训练的呼吁，应该看做是债主要求还债的法律对应词，它就像是到期欠发

的工资。如果公司不能出这笔钱，那就可能需要动用公众的基金，或者取得他们的支持。有时，这种支持甚至不需要政府付出什么代价，用贷款保证、保险和其他手段都可以。但是，政府无论给什么支持都行，就是不要发救济金。这种支持在实现转化的计划中只应该起到救急的作用。高级经理人员如果不能实现转化计划，就要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有一家办不下去的公司的董事长要求工会减少工资，说是为了挽救公司，但是他自己年薪高达40几万元，却还要增加，这样的事真倒胃口。原则上我不反对高级经理人员富起来，甚至富得不干净也罢了，但是，他们只该拿发达钱，不该要倒霉钱。

我们对投资和革新的概念应该按照第三浪潮经济的方向来改变。我们向新机器投资一块钱，都应该同时在人的资本方面（如训练、教育、重新布局、社会修整、文化配合等）投资几块钱才是。对硬件的每一项投资，都要有相应的软件投资。

这种代价，多少由公司转嫁出去，有多少由公众承担，要看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但是，无疑只有通过硬性的政治手段和经济斗争才能解决。

问题的核心仍然存在：一个接一个的工业要进行转化。只要可能，还要做人的转化工作，不只限于机器。

问：你抨击对不中用了的工业加以“保释”的作法……

答：对转化不想想大主意，是害了怀旧病。既无用，又浪费。

问：自由市场的办法怎么样？

答：我已经说过，那样更糟。它连起码的表面的吸引力都没有。

它是建立在对新经济完全外行的基础上的。它假设老式工业下台，工人解雇，新的工业就会自动蹦出来，把过剩的东西吸收进去。

它假设经济结构可以成倍增长，使失业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使工资要求降低到至少和生产力增加相等的水平，而不致同时引起威胁社会的骚乱。

它还假设，正确的货币、税收或开支这类政策的某种混合体可能产生一种条件：刺激经济，使它恰好能使多数失业者回到原有岗位或者进入更新的工业当中去。但这是不会出现的。许多老的工作都一去不复返了。有一种设想以为，千百万被解雇的纺织工人、翻砂工人、汽车工人、钢铁工人、橡胶工人和服装工人，反正可以在计算机工业，或通讯、遗传学及第三浪潮经济的其他地方找到工作，那就太天真了。

放任自流至少和盲目“保释”老式工业一样愚蠢，都是天生的怀旧病。

这种任其自然的作法，是预先假定工人可以互相调换工种。它假设，第三浪潮部分所需要的那种技术和第二浪潮是一样的；工人类型也相同，对事物也抱同样态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是一个样。这种人心目中的劳动形象，其实早已过时了。

这只看不见的手需要帮助。为了使第三浪潮部分能吸收第二浪潮部分的失业工人，有些事情是必须做的。即使工作的实际数字没有减少，成千上万的人为了想在新工业当中效力并且能适应形势，也得要接受再训练。设想重新装备的过程会奇迹般地自动产生，而不需要对教育、训练和其他努力给以支持，那就跟相信神话差不多了。

问：但是一个由大企业控制的政府，会同意这种政策

吗？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目前的政治趋势看来，你的建议是否只有通过群众运动进行斗争，才有可能实现？

答：问题不在大企业。当然，政治斗争是需要的。但是问题在于第二浪潮的既得利益者（包括公司、政府、工会各界）同第三浪潮势力（包括一些公司、某些工会会员*，一些群众组织——消费者、环境保护者、地方主义者的组织）之间的矛盾。围绕着人和工业的转化和更新，存在着可以构成所谓“第三浪潮联盟”的基础。我们肯定能够动员到相当多的人支持这一个主题，就是教育或者叫训练。

这就使我们又回到刚才说过的话题。

需要做很大努力通过训练、再训练、更多的训练来重新调配劳动。训练将成为第三浪潮工业中最大的项目之一。它甚至会成为一种重要的输出工业。

还要重复说一下，当我提到训练的时候，指的不是专业的机械职业技巧，像按字键那类的事。我指的是一些我们还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好的事，帮助人们过渡到全新的生活方式。

无论我们把它叫做训练还是教育，或是其他什么名称，这都关系不大。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想让社会分裂，这类

-
- * 多数工会现在还深深陷在旧时代里，甚至反对长期计划的概念，在美国，劳联—产联的主席莱恩·柯克兰嘲笑向前看到第二千年的想法，相反，“美国通讯工作者”组织有65万会员，其中多数是在美国电话系统中工作的，这些人建立了自己的“未来委员会”，帮助该工会在“信息时代”起作用，它的主要目标是对会员进行更多的再训练，使他们学会明日的先进通讯技术，一些工会在朝第三浪潮经济前进方面至少是个潜在同盟军，但是即使工会不是，他们的许多会员也属于这支同盟军。

支援过渡的工作就是必要的。

即使我们知道怎样做，我不相信只由私人成分来做就能成功。虽然我们应该想出一千种不同的做法，应该通过税收和其他措施向私人成分的训练提供巨额补助，但是，我们也需要彻底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制度。

甚至做了这些努力之后，此仍然会出现大量失调和社会动乱的现象的。

工 作 的 新 旧 观

问：我们已经谈过许多方面的问题了。你能把要点归纳成政策建议书的形式吗？

答：一、“工作”这个概念是种时代错误。它是工业革命的产品。由于工业时代的结束，这个概念如果不是最终消失，就必须用现实眼光给它重新下定义，只有这样它才能把许多生产性的但又没有工资的活动包括进去。要重新考虑像“工作”、“就业”、“失业”这类词的意思。

二、现在就应该着手为所有受威胁的第二浪潮工业制定转化的计划。我们所熟悉的“基础工业”再也不成其为“基础”了。

三、培育新的基础工业：电讯学，生物工艺学，海洋工程，软件，信息，电子学等等。

四、创造并扩展服务行业（将来就业的另一个新基础和关键）。力量要集中在人的问题上：老年人，健康问题，寂寞，照顾儿童。这一部分可以由政府机构改造成建立在为微型市场服务的小单位（包括小商业、无利润企业、合作社、公众机构社团等等）的基础之上。

五、训练还要进行。事实上，训练本身不但可以是录象设备、计算机、运动会、电影和提供工作机会的其他产品的大主顾，还可以成为一个大雇主。

六、打破群体的教育制度。今天的学校仍然在为早已不存在的工作制造更多的工厂型工人。要多样化，个体化，分散化，更小更地区性的学校。家庭教育要多些。父母关心子女要多些。创造性要多些。老一套要少些（老一套工作消失得最快）。

七、即使有了以上这些，大批的人还是不会找到工作的。但是，如果我们帮助他们生产市场上需要的、有价值的货物以及从事劳动市场之外的服务，他们是有生产能力的。这就是说，如果能得到一些指导和服务的话，设计新产品、原料、工具、甚至新庄稼，都是可能的。“自产自用”或自助成分可以代替交换成分中很大一部分，而不影响千百万人过像样的生活。

八、最后是最低的生活保证。即使是“自产自用者”也会需要一些金钱收入的。这些转化的开支没有必要通过常规途径。它们可以作为负所得税来处理，或者可以分散开，私人化，通过家庭、教会、学校、商业、当地政府和上千个其他渠道布置下去，以减少集中化的官僚政治以及使权力积聚在“老大哥”手里。

只有把这些和比较常规的政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开始减少失业危机。一旦我们破除了老的、狭隘的生产概念，承认千百万人确实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即使他们并没有正式工作），我们就能为一个全新的、人道的报酬制度打下一种道义基础，以适应第三浪潮经济为我们打开的新路子。

下编：前 提

10. 论 研 究 之 道

存 免 译

人人都遭受外界各种刺激的袭击，其势之猛，如连珠炮一般。肉体上的刺激影响味觉、触觉、嗅觉；精神上的刺激以思想、信息、形象、符号等形式向我们袭来。汽车里的收音机对准我们大声广播新闻。电视上的一个个镜头、杂志里的广告、电话传来的消息、报纸的标题，有的被挡回去，有的则储存到大脑里了。

我们怎样去编排源源输入的“信息流”，是个关键问题，不光对日常生活是如此，对经营管理的决策、教育、政治组织工作和其他许许多多活动，尤其重要。

为了弄清这个新的未来，我们需要实力雄厚的研究之道——要有能够解释新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复杂现象的新变革论、新因果论；要有新的范畴学、分类学；也要有新的模式帮助我们不相干、不一致的资材串联起来；就当前而论，我们面对这些浩如烟海的资料，大有陷入灭顶之灾的危险。

我们现有的研究之道，就象大烟囱时代的许多机器一样，也快要进博物馆了。

在这章对话里，我们简要地探讨了我认为有用的工具，也就是我的研究方法，以及某些前提。

——阿尔温·托夫勒

问：为了写书，你收集了大量资料。你根据什么把某些资料看成是无关紧要，而强调另一些资料是很重要的？你是怎样从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材料中清理出头绪来的呢？

答：真正的办法——不光是对我来说，人人都不例外——是要有“预感”，换个更为文雅的词，就是要“直觉”。尽管搞统计工作的人想竭力歪曲预感或直觉，搞我这一行的却是少不了直觉的。办事要靠内在感觉，人人都如此。但是，又不光靠这个。人人——不单是作家、未来学家，任何人都一样，没有例外——都塑造了现实的各种模式，碰上一大堆资料，大脑就塑造出一个模式——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模式——来帮助我们理出眉目，再进行处置；也就是去弄懂这些资料。大多数作家的模式是朦胧的，甚至可能对自己用的模式毫无概念。但是，人人都需要把现实搞成个模式。

我想，你完全可以从许多作家的作品中辨认出朦胧的模式——随便举个例子，譬如说巴尔扎克、左拉的作品，更不用说社会思想家的著作了，不管是亚当·斯密的，弗洛伊德的，还是马克思的，都不例外。当然，作家的模式不仅往往是朦胧的，而且也不必象科学上用的模式那样严谨、精确，为了妙笔生花，有时候就顾不得模式本身的框框了，或者要调整一下。尽管如此，模式总是有的，而且往往很复杂。

问：你的模式是怎样搞出来的呢？

答：这种问题谁也讲不透，因为构思模式的时候往往是有点无意识的，何况免不了有许多表面上觉察不到的假设。撇开这些不谈，我一般先从研究的笔记和材料着手——别忘了，可有一大堆呢。这可能是苦读5年书，或者花了更长时间积累起来的。我什么都读：技术杂志、外国报纸、学术论文、信件、统计摘要、国外来的报导等等；小说、电影、诗歌也让我开了眼界；此外，还有采访专家的书面记录（往往一点都没有改动）；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有，既有经济、军事战略方面的，也有机器人、音乐、抚养孩子方面的。

我先把全部材料打乱，再重新整理、分类，探究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其他关系。我一般让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自生自长，它是从材料里引伸出来的。有了模式以后，还会收到别的研究材料，它们或者和模式吻合，要不，就得对模式加以调整、补充、限定，也有可能原来的模式根本不适用了。有时候我用相反的办法，先搞个临时性的模式，再进行研究，根据资料来修改模式。

问：你是怎样写《第三次浪潮》的呢？

答：我先有个不完整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结构模式。一面写，模式也越来越详尽、越来越完备。不过，你一旦搞出和采用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模式，它就会帮你把材料条理化，所以，本来不会发现的种种关系和含义就明朗化了。这时候，你得出了临时性结论。这当然是个很复杂的内在理性认识过程，任何作家落笔之前都有这番经历。

我研究社会变革的时候，先有个假设，那就是社会事件、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都有内在联系；所以，社会变革不同于学术领域里的变革，它不是包装好了来的。

经济变革必然要引起家庭生活、能源、生态体系的变革。这几方面都是互相挂钩的，一个个复杂的反馈环节把它们连在一起。所以，我专门注意研究内在联系。

我的出发点还有个假设：推动历史的决不是一般力量，宁可说是许多股力量或趋势汇合起来影响了历史的发展方向，重大变革就是由它们造成的。

动荡和革命

问：请举个例子。

答：好，就随便拿1930年代斯大林搞的审判做个例子吧。我正在读安东尼·凯夫·布朗和查尔斯·麦克唐纳合写的《论红军的一翼》。这是一本关于社会史、政治史的书，写得很出色。他们两位谈到了希特勒、斯大林的崛起，德国的通货膨胀，罗斯福的上台——实际上把那个时期的历史都写进去了。书中有一处谈到斯大林搞了一系列叛国案件审讯，几乎把他的高级将领和军官统统清除了。凯夫·布朗和麦克唐纳指出：苏联的军力削弱了，而与此同时，希特勒却正好在迅速扩充德国的军力；所以，用我的朋友伊利亚·普利高金*的话来说，那个时候，内部动荡（审判）正好碰上了外部动荡（希特勒崛起）。我要是看出了内部变革和外界

-
- * 普利高金，1917年生于莫斯科，由于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成就，1977年获诺贝尔奖金，他现在主持布鲁塞尔的国际物理学化学研究和奥斯坦的得克萨斯大学统计力学和热力学中心，他在非平衡系统热力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物理学或化学的范围。

变革之间的联系，就要探究一下，难道甲不会推动乙吗？

照我看，普利高金说的是任何现象，不管是化合物，还是社会体制，内部时时都在变化，也可以说总是动荡不定的。任何现象或体制的内部都有“子系统”，它们在不断振动或波动。其中某种波动的振幅偶而会强化到足以破坏整个结构的地步。不过，在规模大一点的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或激变之前，各“子系统”的几起波动往往必须先汇合起来，或者彼此间要有强化作用。

此外，每种现象都有个外部环境。外部环境中也有波动，大的外部波动可能正巧发生在几起内部波动汇合的时候，这就使整个体系更容易发生变化或剧变。

普利高金说，在一定条件下，一起或几起波动破坏了某个结构之后，会形成一个新的、更复杂的结构，要想维持它，就得有更多的能量。他把这种东西叫做“扩散性结构”。

人类的情况也相似。我们正走向新的、更多样化的社会结构，为了维持它们，要有更多的信息。所以，我对普利高金“波动论”中的这个部分很感兴趣。

许多社会情况、经济情况正好符合这个公式。譬如，今天各工业国都经历猛烈的内部变化，部分的起因是技术革命。在这场内部动荡中，汽车、钢铁等工业衰败了，电脑、遗传工程等崭新的工业正在兴起；与此同时，非工业国的越来越敢作敢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暂时团结等等，又产生了外部压力，加强和加快了工业国内动荡的势头。许多内外力量汇合起来，才形成迫使高技术经济实行根本性结构改革的压力。结果是出现了第三浪潮经济，它处在更高的、复杂得多的发展阶段，不过，对信息的依赖程度也就大得多了。

从单一层次分析的马克思

问：你的社会变革观难道和马克思的模式没有相似之处吗？

答：两者的不同大于相似。20几岁的时候，我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阅历深了，当了记者，亲眼见的世面多了。变革又以更快的速度改变着高技术社会的面目，这时候，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有些新情况了。

我年轻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规律的解释猛一下叫人开了窍。马克思是个了不起的天才。他的思想赋格曲*那样严谨、复杂，叫我想起了巴赫。连看不起马克思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了，实际上也受过他的影响，就象我们受过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的影响一样，他们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

有了马克思之后，就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去看待技术了；也不能再忽视阶级了。我们不能再把历史看做一成不变的，也不能再把政治和经济当做各不相干、毫无牵扯的两回事了。在今天的世界上，对马克思一无所知，就等于半文盲。这个星球上有一半人把他的当经典。不过，马克思本人是旧的第二浪潮社会、也就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塑造他的是关于这个社会的种种假设，其中有许多已经完全失效了。

我现在还是专门集中研究他写过的问题：社会变革、技术的作用、矛盾、突变、最广义的革命。但是，我现在的见

* 赋格曲是西洋音乐中严谨而复杂的一种复调曲体，主题先由一个声部奏出，然后其余各声部按规定轮流模仿。——译注

解和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有了根本的区别。

最关键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把经济看得高过一切。

问：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同意经济是个体系，而且有它内部的活动。但是，他会一口咬定其他社会体系是从属于经济的，而你却认为经济不过是许多“子系”其中的一个，在这一点上，看来你和马克思主义有着重大的分歧。这是你和马克思主义分手的根本原因吗？

答：马克思主义者确乎认为非经济的东西不过是以技术—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而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不是我和马克思主义分手的主要原因。

我早在思想上和马克思主义分家了；当时，日常生活的现实毫不留情地反驳了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是学生；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断定美国正处在经济大萧条边缘，要重演1930年代的旧事。他们谈美国迟早会爆发“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后来却出现了1950—60年代的繁荣。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他们还作了别的错误预测。美国工人阶级没有“贫困化”。照我看，美国社会在性别、年龄、种族方面的分化，比阶级分化重要得多。想一概用阶级分析来解释这些现象，是硬要现实去服从理论。

要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权威性的那一整套东西搬来美国试验一番，而得出的结论却又大谬不然，那就不得不怀疑这种了解变革或引起变革的工具在更普遍意义上的效验了。

我心里越来越清楚，不能借助马克思主义去了解高技术世界的现实。今天，用马克思主义来诊断高技术社会的内部结构，就象在有了电子显微镜的时代，还是只用放大镜。

问：你是说阶级冲突今天已经不是变革的焦点了？还是

说，你认为它在高技术社会已经无关紧要了，不过在其他社会还是个主要问题？

答：主要？不，绝对不是。技术和经济固然重要，却不是其他一切所谓“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当然比跟着他跑的人聪明得多，马克思断定社会变革的根源如不是阶级斗争，就是更带普遍性的技术发展和同时在经济关系上所引起的变革；他还说“生产手段”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等等。

可能在某些社会里，阶级分析有助于得出粗浅的认识；在一个阶级不顾一切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地方，如果经济地位又很悬殊，阶级冲突在这个特定阶段就成了社会内部的主要冲突；这时候，阶级分析当然是有用的。但是，把特殊情况一般化了，把阶级冲突普遍化了，硬说它是最重要的，而且先验地断定它在任何时候、任何阶级社会全都适用，依我看，是不正确的。

今天，在有的社会里，阶级冲突很尖锐，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他许多冲突都是次要的。但是，依我看，这个现象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就算情况真的如此，把阶级冲突和种族、族群、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冲突等相比，它究竟重要到什么地步，突出到什么程度，情况也是不大相同的。在“原始共产主义”之后，“共产主义”之前的一切社会中，马克思把其他冲突都放在相对次要的地位。他强调阶级，是出于欧洲中心论，是从他所生活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推断出来的。

问：我同意你的看法。先验地假定阶级分析能揭示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把阶级冲突说成社会唯一的主要冲突，是极大的错误。但是，如果否认阶级分析是了解现代社会的有力

工具，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一种重要的冲突形式，恐怕也是站不住脚的。我想你不至于有这层意思吧。

答：没有，我的看法是，虽然马克思原来的分析叫人一惊之下大开眼界，尽管它既严密又复杂，叫人目瞪口呆，却始终只是从一个层次出发。

问：只从一个层次吗？不管你是否同意它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终究是一种涉及面很广、包罗万象的理论，它谈到了生活的各方面。

答：不错，但是社会上有许多根本性的紧张关系，阶级冲突只是其中之一；把它当做全部历史的中心，就好像只从一条缝里去观察复杂现象。

你可以用两性冲突来写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这叫人一下子想起了弗洛伊德或某些现代女权主义者；也可以用种族冲突、集体之间的冲突、政治冲突等等来写。你也可能想沿着多种多样的冲突轴线，把社会分成许多部分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照我看，在一定条件下，这样做会得出一种不完全以经济为中心的、更多层次的工具来了解社会，甚至还可以用它来改革社会。

要知道还有其他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模式，主要看你想得出什么结论；可靠而又万能的单一模式是没有的。

问：连你的第三浪潮模式也算上？

答：当然罗。

第三浪潮模式

问：请解释一下第三浪潮模式。它的出发点如果不是阶级冲突或其他冲突，那又是什么？

答：我第一步用的方法近似归纳，也可以说凭经验，那就是先找出看来是各种文明共同的东西，譬如，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能源体系。它们都有这样那样的生产方法，也有生活所必需的服务行业。它们都有产品流通领域和服务体系。能源、生产、销售体系显然都是密切结合的，可以说共同构成了一个“技术领域”。

各种文明在社会体制方面也好象有个生态问题，可以叫做“社会领域”。在各种文明内部，这些组织或体制之间都有牵扯，方式是多样化的。以我们的文明为例，小家庭安排了孩子的一生，让他在实行群体教育的学校里读书，这种学校训练孩子将来在公司或社会主义生产企业里干一辈子。所以，在我所说的社会领域内部，还有许多相互影响的“子系”。

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各种文明都有交流信息的体系。有些社会的信息交流不多，派送信人到乡下去就行了；或者象波斯人那样造起塔楼，塔楼顶上站着一个嗓门大的人，向下一个塔楼里的人喊话，信息就这样传递下去了。但是，一出本村就几乎没有什么信息要传递的了，所以，通讯体系很不发达，不过，所有社会都有某种原始的或非原始的通讯结构，我把它叫做“信息领域”。

信息领域和技术、社会领域也是线线相通的。

此外，一切社会都在某个“生物领域”内活动，而对任何一种文明来说，这个生物领域内的条件可能不时地在变化，叫人眼花缭乱。各种文明也都有个“权力领域”，在这个领域内，通过正式、非正式的政治机构来分配权势。最后，一切社会都还有可以叫做“心理领域”的东西，各种亲密的关系、主观意识、个性等都属于这个领域。

任何文明或社会的大部分活动（不是全部）都被纳入技术、社会、信息、生物、权力、心理领域的总和之中。用这种分类法，就可以着手系统地仔细研究这些各不相同的活动领域内部和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了。

问：文化该归入哪个领域？信息领域吗？

答：不对。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又是一个部分，一会儿就会谈到的。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每个领域内都有许多复杂的成分，既密切相关，又在不断变化、波动、发展。只要我们打算对每个领域加以分析，是能够更详细说明它的各种成分以及成分之间的联系。

然而，这些领域本身显然也在不断变化。在整个体系内，它们之间关系是相互依赖，在《第三次浪潮》中，我不过提示了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说得更详细一点。

我们不但可以讲清不同领域之间的“宏观关系”和每个领域内部“微观关系”，还可以讲清某一领域里的成分和另一领域里的成分之间的“远距离关系”。总之，可以按我们的想法把模式搞得很复杂、很详细，而且可以在随便哪一层面上把抽象概念条理化。这个模式能把大量的信息储存起来、联系起来，为我们整理出头绪，这样，模式就有用了。

我们可以借助它去研究任何一种文明，并且把不同的文明加以区分。不过，模式的流动性也很大。社会上各种成分出现时，我们可以靠模式去认识它们，把它们看成互有联系、互相促进的变革浪潮的一部分，所以，我才用“浪潮”来作比喻。

“社会浪潮论”让我们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变化过程，而不是把历史当做依次而来的一个个“阶段”，好象每个阶段只是一张静止的图片。同一社会在同一时候不止经历一种浪潮。譬如，日本的家庭体制还在向小家庭方向发展，这是第二浪

潮变革的内容之一，好比是传统的工业化浪潮在自趋完成。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第三浪潮的许多方面正在日本兴起。

所以，我们不把社会看成一元的，而是把它设想成由许多同时发生的运动，也就是互有牵连的变革浪潮所构成的。可以把社会比作第一、第二、第三浪潮各种成分的大杂烩，也可以按每种变革浪潮所占的不同比重等等来看待它。浪潮模式立足于变化过程，而不是光看结构。

不过，文明的变化过程当然很复杂，上面所谈的，只是我写《第三次浪潮》时候用的那个模式的部分情况。

问：你的那本书谈到结构变化，不过，你还提到“文明原则”。请问，怎样把这些原则归入你的第三浪潮模式？

答：我谈到各种领域可以叫做“结构成分”；这是任何文明都有的，是通过种种复杂途径接通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东西，打个譬喻说，它贯穿一切领域。例如，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超级意识形态”，为的是证明自身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还用它来解释自己在历史上和宇宙中的地位，说明自己的活动是正确的、合理的。这就是蒙在全部东西上面的文化层，它在塑造整个结构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在一切领域里，从家庭生活直到技术，无所不在。

此外，每种文明似乎都按照与它一致的某些原则在活动，它们是文化的一部分。我最有系统地把这个模式用于工业文明，其中的各个领域都受标准化、同步化、专业化、集权化、集中化、极度扩大化等原则的影响，它们是工业化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

问：“左派”把两性、种族、经济、社会关系和其他类似概念当做组织原则，而“浪潮”说则注重标准化、同步化这些原则。这难道不是太抽象了吗？

答：可能吧；不过，也很具体，而且我认为要全面得多。当我们把一块块东西拼起来的时候——不把它当做文明七巧板游戏中一块块形状固定的小板，而当做变化的东西，象电影镜头——我们就能得出一幅近似整体的图象；它的各部分都在发展，又有相互影响、相互强化的作用；它们的活动是同步化的，或者彼此抗衡、抵销、冲突。种族歧视、性格歧视、阶级冲突固然重要，光用它们来说明整个社会或文明以及它的趋势，是远远不够的。

人有自己的生活，每天例行公事，生、死、爱、恨样样都有，而文明就是这样的人组成的。早晨在刷牙的孩子（然后去上学，被培养成终生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的人）和博物馆里、历史书上的大艺术家、大政治家一样，都代表我们的文明。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抚育孩子的方法、孩子生活标准化的程度、早晨上学的时间和家里其他人作息时间的同步关系、其他学生的群体活动；如果研究一下孩子日常生活所依靠的技术和能源、学校体制以及它与国家、家庭、教会的关系；再研究一下对孩子的长成有影响的信息媒介，他或她所处的物质环境，生下来就碰上的政治权力结构等等，我们就好象从一个具体人身上看清了整个文明。

这样一来，我提出的模式、它的各种“领域”、“原则”、“超级意识形态”就都和实际生活挂上钩了；它不只是个抽象的、学术性的、光秃秃的模式，而是和行为有直接关系；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也就清楚了。

我认为这个模式在几方面有很大优越性。

问：了解社会当然需要模式。你把整个体系分解成你所强调的几个领域，因为再原始的社会也少不了它们。但是，

也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分解社会。譬如，每个社会都得有政治决策体制，管生产、消费的经济体制，确定男女作用和地位、两性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的亲属领域；还有个可以叫做社会体制的东西，它确定了宗教、族群、种族的特性。

用这些范畴来划分整个体系，是以社会关系、社会集团为重点，它们都是历史变革媒介。不管怎么说，创造历史的通常是组织起来进行各种活动的人。

所以，为什么要用你注意的那些领域而不用其他的呢？后者和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有更直接的密切关系，社会活动是围绕这些领域来组织政治、经济、种族、文化、两性关系方面的变革的。

答：我当然不反对用其他模式。没有一种模式是十全十美的。问题是要看针对某种具体情况，哪种模式对它最实用。第三浪潮模式的目的是既要尽可能包罗万象，又要把问题讲清楚，要尽量帮我们本来似乎各不相干的资料理出个头绪。

按照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创造历史的是社会活动，而我的出发点不同。譬如，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发明了第一颗原子弹，他们当然“创造了历史”，然而，很难说他们是你所指的“社会活动”。所以，围绕特定的社会活动、围绕它们所形成的轴心来设计一种模式，虽然可能说清某些问题，我总觉得太勉强了。

此外，尽管我不想在模式问题上把话说绝了，第三浪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它的核心是“冲突”其中确实有“冲突论”的含义。

冲 突 论

问：有些未来学家设想“后工业化社会”多少会在平平稳稳中到来，你的看法却与此不同。

答：是的。在我想象中，正在露头的新世界不是无冲突的，通向它的变化过程也不是无冲突的。我反倒认为正在进入一个社会冲突、政治冲突都很激烈的时期。认识它——不管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我们社会内部——要靠冲突论。

问：这种冲突论有什么用处？

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表面上各不相干或独立的冲突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帮我们分清主次，这样我们就专门去注意主要冲突了。

问：你谈到浪潮模式能帮我们把事情看透彻。譬如，你讲到“超级斗争”。请解释一下从浪潮变革模式中得出的冲突论。

答：首先，我说到席卷整个社会的历史性变革浪潮时，不是单指某一种特殊变革，譬如说，技术方面的。我指的是整整一系列有联系的变革，它们之间互相加强、互相促进，推动整个体系朝明确的方向发展。

第一浪潮变革（发展农业）时期就已经如此。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也就伴随着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宗教体制以及对付周围环境的一套办法。

工业革命兴起第二浪潮变革的时候，开始出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体制、新道德准则和办法，这一切和农业文明原有的第一浪潮体制发生尖锐的冲突。

当然，浪潮概念不过是个比喻。变革浪潮是人搞起来

的，是人民，是个人、有组织的团体、军队、教会、做研究工作的实验室、企业界人士、政党，等等。

从农业生活方式中得到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的人，是要和发起工业革命的“崛起”集团拼个你死我活的。

这样的事情多的很，已经司空见惯了。更有意思的是，一个社会可以同时经历几种变革浪潮，它们之间有冲突，而且波及整个社会；有的冲突如滔滔洪水，有的如涓涓细流，构成一幅政治、经济、社会的冲突图。

拿中国做个例子。中国人口绝大部分是农民，他们基本上生活在第一浪潮文明时期。共产主义革命初级阶段的目标是引导中国进入工业时代，所以是有意识地从农民身上拼命挤出钱来投资工业。这都是学苏联那一套。总而言之，中国当时按第二浪潮战略办事，想发动传统的工业革命。第一个五年计划里，重工业投资整整占了58%。社会上确实出现了一股工业化浪潮，但是始终没有大进展。共产党内部有激烈的冲突，全国也如此。所谓“第一浪潮”努力强调发展农业，而“第二浪潮”工业派则要求多建设钢铁厂、纺织厂，他们要更多更快地发展工业。1958年毛发动大跃进，1960年苏联人撤走了，这两件事表明从搞工业转向以农业为基础，我把它叫做从第二浪潮战略转向第一浪潮。

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这当然只是泛泛而论。

今天中国又在热烈辩论；有一派又主张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也就是发展第二浪潮，而许多人显然还倾向以农业为重点的第一浪潮。不过，我估计现在也有少数人开始探讨发展第三浪潮的可能性了，想利用高技术来创建先进的经济，而不强制全国去经历一次大规模破坏性的工业革命。这就出现了一个新因素，形成了新轴心；人们将团结在这个轴心的

周围。

所以，我认为这些浪潮是在宏观的层面上引起冲突。还可以看出全球性冲突的迹象：高技术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在竞相创办第三浪潮工业和抢占与它有关的新市场；譬如说，几乎完全靠使用脑力的软件市场。

冲突概念当然也适用于一国。譬如，美国就有正在衰亡的第二浪潮地区和日见扩展的第三浪潮地区之间的政治冲突；只要把底特律和达拉斯一比就清楚了。

把范围再缩小一点，工业部门之间也有冲突。钢铁、汽车工业要求华盛顿方面给予支持，而电脑、电子工业却反对这种政策，它们强烈要求支持尖端工业。一派主张关税保护，另一派要求实行贸易自由。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家也有同样情况。

大企业内部——我参观过许多——往往有第二浪潮利益的顽固势力在反对第三浪潮利益的新势力。譬如，在许多搞多种经营的大公司里，比较老的部门搞的是大规模生产，它们的主要业务是出售劳务。公司里的新部门搞的是高技术的，它们越来越多地出售按特殊规格生产的产品，这种产品需要花很大的脑力。这就在经营方针、工人待遇、组织方式、投资比例等问题上引起根本性的内部冲突。

其他机构内部也有同样情况。老派的教师要求按第二浪潮时代严格的、标准化的方法上课，反对新派教育工作者（往往是比较年轻的，但不绝对如此）；后者要求更多地因人施教，课程和教学法也更应该多样化，而且要求改革教学体制本身。在医疗卫生、能源、通讯，乃至各行各业，都同样有第二浪潮派和第三浪潮派之争。

如果我们调查一下某个组织，看谁站在第二浪潮的标准

化、集权化、专业化、集中化、极度扩大化原则一边，谁又是大体上反对实行这些原则的，我们就能看到一幅 第二浪潮、第三浪潮阵容分明的图象。

用相似的冲突分析法不仅能澄清工业、教育、政府方面的现状，而且还能搞清家庭生活、男女的作用和地位、种族、文化等方面的现状。

当一股相互有联系的变革新浪潮席卷从技术、能源体制到家庭结构、政治等各个方面的时候，文明就好象分裂了，引起了一层套一层的冲突，在整个制度上的每个层次都有冲突。

一个国家，譬如说巴西，要是同时经历着三种 变革浪潮，我们就会看到三条并存的冲突“战线”。

只要看清贯穿社会各阶级、各种族、各集团的所谓“浪潮战线”，我们就会对今天的政治——社会生活里的政治、乃至各种机构内部的政治——得出全新的概念。文明方面的这些冲突构成了“超级斗争”，由此产生社会上的其他各种冲突。

这就是我的“冲突论”，它的思想基础是“变革的浪潮”。

11. 变革的风源

秉 旺 · 译

我们是怎么陷进一场革命里来的？报上的大标题有时给人印象，似乎全球风雷激荡，结局只能天下大乱；有时又好

象我们正身不由己地走向某种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它势在必行，呼之欲出；而要想改变这一进程，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光谱的一头是：机遇，事件，意外，虚无和飘忽；另一头是：需要，宿命论，浩瀚汹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它前面，个人是没有法子的。

个人能影响历史吗？促成变革的种种因素当中，哪个最重要？是技术？还是经济？

这些问题，我们特意留到最后来谈。

——阿尔温·托夫勒

问：很多人读了你的著作，得到这样的印象，认为你是技术决定论者或者经济决定论者。有时候，你好像确实是把技术或经济看成变革的关键。你让各种次要的制度各以其特点互相渗透，互相结合。你从每一个次要的制度里注意到了内部的种种起伏运动，如果经过激荡而有所增强，或者与外界一次重大的波动相呼应，就可能引起一场重大的结构变革。不过，你提出的那些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原则（例如标准化或集中化），却多少都是适应经济需要而产生的。

甚至当你谈到种族或性别问题的时候，思想上往往也带有经济色彩，就好像你的概念都在一口经济熔炉里炼过似的。那么，你对于别人指责你书里有技术—经济决定论，又怎么回答呢？

答：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不过，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我坚决反对说我是技术或经济决定论者的说法。随便什么人只要仔细读过我的书，对于这点都是很清楚的。我不相

信任何一种单一的力量能够左右制度，无论它是技术的，经济的，性别的，种族的，还是生态的力量。不同原因产生多种不同的力量，会在不同时期变成突出的因素。因此，我认为要想找到一个单一的、控制一切的成因，就等于要找一个“牵动整个链条的环节”一样的错误。我完全不是这样想的。

我想得更多的是过程，相互的关系，运动的节奏，不平衡状态，以及各种领域，而较少考虑各种单独的因素；对于相互交叉活动的开放制度想得更多些，考虑单程的因果关系少些。

这种对待因果关系的态度又是一条说明我跟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的地方。在马克思看来，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演绎一下就是：宗教、艺术、伦理、价值观、法律和一般的文化，只是反映阶级地位并为它服务的。反过来，阶级地位又由经济和技术力量来决定。

马克思当时是想在经济学里寻求一个不可再分的单位（某种原子），以便根据它来建立经济学的科学理论，然后再在理论之上摊开一层所谓上层建筑，就像在蛋糕上面浇糖霜那样。可是，他选作模式的科学，基本上仍然是牛顿时代的，是爱因斯坦之前的类型。

不管第三浪潮模式有多少不足之处（我绝不说它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晓的），它总容许有比较松动、多样化的相互作用的余地。它提供了一幅更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图。它认为，技术有时候好像能够左右制度，可是，技术本身又不断受到其他力量的影响。

一个社会把重点放在技术上，不仅有经济上的考虑，而且也受那个社会特定的自然资源、教育水平、文化、乃至宗

教戒律、环境等的影响。这就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的观点了。

我的观点，同那些认为所谓上层建筑也可以影响经济和技术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很不一样。因为他们在承认这种反作用的可能性的同时，对于他们来说，各种不同的思想、法律、价值观、宗教等等（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只是阶级地位的反映，而阶级地位从根本上说，又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样，他们的理论就不免有点循环论的味道了。总之，经济和技术必然直接或间接地，这样或那样地左右整个制度，这就是他们的看法，在我是不能接受的。

问：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论据不足（部分理由是说它是经济决定论），即使有理，也还不足以你们的观点开脱，不受到同样的批评。你经常说技术和经济如何如何影响其他典章制度。例如，在《第三次浪潮》这本书里，你就指出，家庭对生产制度的变化是怎样反应的，却很少分析另一方面。譬如，你没有说明，经济关系对家庭关系的变化有什么反应。

答：但是，这并不是说家庭没有反过来使经济制度发生变化。我相信，它确实使经济发生过变化，现在也仍然这样。不过，在时间上要有一个过程，主要影响大约要25年以后才能觉察到。同样，教育对儿童有很大影响，当然也影响到社会，但是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只能在以后的阶段才能看出来。所以，我相信这种情况，拿经济和家庭的关系来说，最初，经济是一个强大的支配力量，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就慢一个时候。但是，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基础”就决定“上层建筑”了，或者，经济就是可以独立变化的东西。

在所有我的著作里，我一直想尽办法来说明非经济因素是怎样影响经济的。例如，在《未来的冲击》这本书里，我

提出了，社会和文化的加速变革，和其他事物一起，正在压缩经济关系。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文化的多样化，正在重新组织市场。我也用一大段文章专门抨击了计划和政府决策工作中的经济集权主义。所以我认为指责我是经济论者或是技术决定论者都是没有根据的。

问：照你的看法，我们是不是一方面看到第三浪潮的各种经济形式风起云涌，同时又让第二浪潮的家庭形式保持原封不动？

答：我看不见得。

问：那么，基本上不可能了？

答：我不说不可能。不过，我确实相信，一种社会制度或一种文明里边有一个领域起了变化，其他方面就会跟进的。我相信是这样的，可是，这仍然是个假设，还很难说。

关于文化落在后面的问题，好多年以前，威廉·菲尔丁·奥格本写过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解释一个社会里的不同制度互相不协调时，会出现什么情况。我认为他说得对。今天，不同的变化速度（有些变化是加速度，极端的快）正以十分不同的办法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典章体制，这些典章体制都在极力适应彼此的发展速度。大规模企业的结构变化得很快。学校和庞大的政府机构变化得比较慢。社会的差异在加快，变得更多样化了，而政治制度的变化却不大。这种迟滞不能适应的情况，使社会上出现了强烈的紧张局面。

但是除了变革的速度和节奏之外，我设想，如果家庭生活或者更一般的社会领域里边发生了变化，这个制度的其他方面就会产生变化，要不就是对抗的变化。

问：那么，反过来呢？

答：反过来？对极了。在我们走向第三浪潮的时候，多

数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正经历着家庭生活结构方面的许许多多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影响经济。例如，从小范围来说，社会上如果存在大量单身汉，整个住房市场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这时，你会发现单身汉在郊区买房子了，公寓套房的开间越来越小了。这个，反过来，就会有明显的经济后果。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是，却很可能有成千上万这类的结果流进社会里来。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结果还没发现出来。

譬如，我在1975年《关于经济痉挛症的报告书》里写到的高离婚率和再结婚问题，人口迁移，以及社会变化，一般都会悄悄地促成通货膨胀。我相信它们有助于加速资金周转率。高离婚率又鼓励了“自己干”和“自助”运动。这些对于未来的经济都有很大影响，其中只有一部分在《第三次浪潮》中讲清楚了。但是，普通的经济学家沉醉在第二浪潮时代的早已过时的概念和词汇里，几乎看不到这些现象。怪不得他们的预言往往不能兑现，行动也常常自食恶果。

问：如果技术和经济本身都不能左右制度，那么，根据你的看法，政治也不能驱使制度罗。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只把重点放在政治或者其他任何单一问题上的激进分子，就可能忽视了那些对更大目标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例如，把文化或性别看成只是边缘问题，这就可能铸成大错，甚至会摧毁这类团体的经济或政治目的。

答：完全正确。

这是整个文明的改造问题。如果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或政治因素上，那就注定要犯错误的。

它的另一个含意是各式各样的人都能对这个改造工作有所贡献，而不只限于政治活动家或者“职业革命家”。科学

家，行政人员，哲学家，女权运动者，教员，护士，民权活动家，环境学家，软件设计者以及其他各类人士都可以起作用，不是只作为下边的小分队。

我在《第三次浪潮》里说的话如果对头，如果技术领域、社会、信息、生物以及动力领域都相互关联（不能说只有谁是“基础”，把其余的全部归入“上层建筑”），那么，所有的领域都要同时变革。事实上，在所有这些领域里，迅速、深刻的变化已经发生了。这个星星之火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点燃的，而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活动家或者革命者。

机 会 与 变 革

问：你说不存在一个未来，而是一批可能的未来，我们得从中挑选……

答：是的。但是，所谓未来不完全是事先安排好的，它还有另一面，这点我们没有谈过，那就是“机会”这个因素。我相信机会在社会变革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有一个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例子。

1981年春天，有一天我在一家大报纸《休斯顿邮报》的本市新闻编辑部里，接受记者采访。她问我，第三浪潮是否势在必行。我谈了不少当时的普遍反应：不，我不相信历史的必然性。不仅如此，我还相信，“机会”二字在人事中是相当重要的。我说，甚至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会儿，要是危地马拉有一个什么年轻人向一个士兵扔一块石头，就可能突然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说话之间，突然传来几声枪声，三部电视监视台卡塔开了起来，我们听到大喊大叫：“总统遇刺了！”……整个房

间的人都朝电视机跑去。黑格宣布接管一切。银光灯闪亮了，“机器停印！”等等。真是不可思议！它把我带到了人类史上“机会论”和“决定论”之争。

我不相信任何一种特定的未来必须是预先决定好了的，我当然也不相信第三浪潮是不可避免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仍然倾向同意普瑞高金的理论。我了解他。他提出“机会”和“决定论”同时起作用的论点。这原不是什么新想法。但是，我认为他是用一种新办法把它联系起来了。他说的是，不管由于什么波动和压力，旧结构达到革命转折点的时刻是一定会到来的（这是我替他作的粗略解释）。那时，“机会”就起作用了。制度可以通向无数方向。一旦步骤已完，“机会”就完成了任务，而制度则转向了某个方向。这时，“决定论”就又出来管事了，直到波动造成另一次结构性的危机为止。

再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问：在这一切当中，人的影响、计划、组织有什么影响？个人能不能起作用？

答：当然可以。“机会”是起作用的。还有那些既经决定的方向也起作用。但是，即使在那些看起来已经是安排妥当的领域里，也总有一些弹性，人的影响还有起作用的余地。至少，我们的行动往往可以减缓、改变、抵抗，或者防止己所不欲的结果。设想一个极端的例子：可能出现这么一个人，通过搞第三次世界大战，瞬息之间把第三浪潮给取消了。抒写未来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

问：我们设想25年前古巴有一个未来学家，他环顾四周

之后，很可能预言说：未来的古巴也许和危地马拉或今天拉美的某个国家差不多。或者，假设这个人独具慧眼，也许会在心中形成一个关于革命的剧本，预言革命或重大变革的可能性。但是那场实际的革命，当然主要靠的是人的活动和干预。这两个剧本的区别似乎基本上都要看革命运动和卡斯特罗……

答：几种解释都有可能。首先，不用说，在所谓的历史力量（用我的譬喻来说，是变革的浪潮）的幕后，站着的是一个一个的人。“力量”或“浪潮”不是物，不能用来套某种模式。

一切变革、战争、进步，所有的历史上的成败无非是由人（包括普通的人在内）决定和选择造成的。

对于卡斯特罗这个人（我猜想你是把他当作革命领袖的代表人物来看待的），我们可以这样来作分析：

一、机会的因素：此人精力充沛，机智而有魄力，恰好在巴蒂斯塔政权临近崩溃、人民愤怒到了顶点的时候，应运而生。同样个性、同样能力的卡斯特罗，如果早出或晚出10年，都不会赶上这个机会的。纯粹是机会使巴蒂斯塔和卡斯特罗在历史的同一时刻走到一起来了。

二、辅成的因素：卡斯特罗不过是在古巴出生的成千上万个婴儿中的一个，机缘凑巧，历史的力量使他成为游击队的领袖。从这个角度解释，如果没有卡斯特罗也完全行。只不过是另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应运而生，出来对付紧急局面罢了。必要时，外部条件也可以创造有魅力的领袖人物的。如果不是卡斯特罗，也会出别人。

三、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古巴革命完全是运用阶级和其他力量的结果，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用苏联的术语来

说，革命时刻的到来，是“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有没有卡斯特罗先生，一场革命都会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预先决定了的，只有次要的因素，如人民，才听任命运的摆布。

看这个问题，有一个似乎可行的办法，是把其中的一些因素揉在一起。我们的回答可以不必含糊其词（“也许这样，也许那样”），巴蒂斯塔政府的路是走到头了，再也无法驾驭那要推翻它的力量了；可以说，那场革命，早该发生了。卡斯特罗在历史时刻成长起来了，历史又造就了他这个人。他从本人也从古巴出发，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巴蒂斯塔政权摇摇欲坠的那个时刻，古巴要倒到哪一边？由谁来控制政权？都是看不清楚，碰运气的事。但是，一旦卡斯特罗抓到了权（当然是在出力加速原政权的崩溃之后），未来就再一次肯定下来了。

对这种说法，我有怀疑。事隔多年了，我仍然记得卡特罗对华盛顿的那次洋洋得意的访问，以及他对“全国记者俱乐部”的一番讲话。我总在想：如果当时华盛顿的决策人物答应对卡斯特罗提供经济援助，而不一味抱着敌视态度，今天的古巴会是什么样子呢？

所以，尽管“机会”是起作用的，但我想“人的干预”也是有影响的。如果俏皮一点，可以这样说：即使人的干预无效，我们也要装做有效的样子呀！我们如果明知自己的活动毫无作用，那么，我辈之为人，活得还有什么劲儿呢？

超现实主义的胃口

问：你自己怎么样？对你也适用吗？你需要“起作用”

的实感还是幻觉来使你高兴呢？

答：对了。“起作用”是很起作用的。

不过，也不能太认真就是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既充满残忍、忧伤、愤怒，又有光辉前景的世界里，我们是过客，唯一使我们能生存下去的办法，是要有幽默感，要有吃得下超现实主义的好胃口。

必须承认，我们无非是奇妙的大千宇宙中的一分子——活得挺好，爱开开玩笑，也爱开我们自己的玩笑。

我写啊，写啊，在还没有一个读者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了。我写，因为我想让人们相信我的想法从道义和知识上都是正确的。还因为写的过程也在改变我本人，澄清我的思路，也组织和安排了我的时间和生活。我写，是因为要不这样做，我就会觉得空虚、不满足。

我写，因为我从周围嘈杂、貌似混乱之中看到有过去不曾注意到的新东西在冒头，而我能把这种新鲜体会转呈给读者之际，我感到了一阵小小的欣慰，就像当年那个西班牙探险者站在“达里安峰巅”号上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时的心情一样。

每册：0.50元